目　录

一

吴哥文明的衰亡

关于吴哥的衰亡史，我们知道得很少。在十三世纪后期，柬埔寨遭到一场洪水，大湖里的水涨到吴哥通王城的城墙根，最后灌进城内。据传说，暹罗（泰国）王曾经从陆路派船前来营救柬埔寨王，抢救吴哥的珍贵佛像和佛经。那时水涨得那么高，连当时正侵占柬埔寨东南端的占婆军队都不得不放弃其占领区。据传说，当时柬埔寨君主塞纳加① 就在这次临时放弃吴哥王都的时候死去。后来他的儿子施哈努回到吴哥，即位为王，修复了堰坝和灌溉渠道等等，巩固了他的统治。

关于施哈努王在位的情况，人们所知极少，

---

① 柬埔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名叫塞纳加的国王。正如下面的施哈努和达柴二人一样，他是作者所引用的传说中的人物。——译者

只留下这样一个传说：

施哈努王非常爱吃一种甜黄瓜，而在柬埔寨，只有一个人会种这种瓜。他决心独享这个人所能生产的甜黄瓜，因此他建立了一个皇家瓜园，并任命那个园丁——他的名字叫达柴——为皇家瓜园长官。后来达柴诉苦说，经常有些小偷前来盗窃这种美味的瓜果。于是施哈努王赐给他一根长矛，并在皇家瓜园长官的头衔外，加封他为皇家瓜园守护官。

据传说，有一天夜里，施哈努王忽然急不可待地想吃新鲜的甜黄瓜，再不然就是突然担心小偷会来偷瓜。于是，他只带了两名女卫士，从王宫来到皇家瓜园。

夜色很黑。忠实可靠的达柴看见有一个陌生人半夜里走近瓜圃，便举起长矛，对准来人用力刺去。矛头穿过国王的身子，登时把国王刺死。于是吴哥通王城（当时叫恩达巴特）的王宫里哭声震天。不久，皇家会议开会讨论由什么人嗣位为君。由于找不到一个人在德行、贤明和忠诚诸方面能够超过老王，他们便决定拥戴皇家瓜园长官达柴登上王位。于是达柴嗣位为柬埔寨国王。

他娶了已故国王施哈努的女儿，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根据记载，根本就不存在施哈努这个国王。但是，这一类的传说，往往反映一定的事实真象。看来，施哈努王大概就是柬埔寨历史上的阇耶跋摩八世。①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达柴就是1295年前后即位的国王因陀罗跋摩三世了。② 至于他是怎样成为国王的，现在很难确定。不过，看来因陀罗跋摩三世不仅建立了新的王朝，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醯那衍那（小乘）佛教的信奉者。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国王阇耶跋摩八世并没有被杀，而是让位给他的女婿，尽管他自己有一个儿子，在法律上理应嗣位为君。在班迭斯雷寺③ 发现的一个碑文证明，当时老王还颁布

① 阇耶跋摩八世（Jayavarman Ⅷ）在位期间大约为1243—1295年。——译者

② 因陀罗跋摩三世（Indravarman Ⅲ）在位期间大约为1295—1327年。《真腊风土记》作者周达观随元使赴柬埔寨，即在他即位的初期。——译者

③ 班迭斯雷寺（Banteay Srei）在吴哥东北，为吴哥地区最精美的建筑之一。——译者

了公告，祝贺全国臣民有一个精力充沛的青年国王代替衰老的君王。据另一记载，合法的太子曾经设法推翻新王，但没有成功，结果被斩去脚趾（这就使他自然而然地丧失了充当国王的资格），并被投入地牢。假如这些报道属实，那么，闍耶跋摩八世的公告就未见得是他本人甘心情愿颁布的。

历史家勒克累认为，施哈努和达柴的传说，反映了十三世纪末叶的一场宫廷政变，实际上并不是国王的园丁无意中杀死了老王，而是一位拥有皇家园圃长官的头衔的宫廷显贵发动了一次政变。因陀罗跋摩三世很可能就是新兴的小乘宗教的主要代表人物。事实上，在他以后，所有柬埔寨国王都信奉小乘佛教。因此，在那场大洪水之后不久，达柴——亦即因陀罗跋摩三世——的即位，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场宫廷政变同吴哥的衰亡是有关联的。

泰族人接连不断地侵入柬埔寨，无疑是柬埔寨人撤离吴哥的一个重要因素。泰族人从北方来到肥沃的湄南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

个国家终于隔断了柬埔寨同它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发源地——印度的联系。据我们所知，泰族人最初在1220年前后挣脱了柬埔寨的统治，然后接连不断地侵入柬埔寨，最后甚至攻占了吴哥王城。当暹罗国王们在距离柬埔寨只有二百英里的大城府① 建都以后，柬埔寨的国王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挑战，还是以回避为妥。当吴哥在十五世纪数次被泰族人占领之后，柬埔寨的国王们就把他们的首都迁到金边（当时叫札多木），后来辗转从金边迁至菩萨、洛韦、乌东，② 最后又迁回金边，直到今天。

我们不知道吴哥究竟是在何年何月以及在什么具体情况下被放弃的，因为随着新王朝的出现，就不再建造寺庙了，而关于这段时期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寺庙里的碑文。有人提出一种看法，认为有很长一段时期，差不多有一世纪之久，当全国已经逐渐改奉佛教之后，柬埔寨王廷依然是婆

① 大城府（Ayuthia），亦译阿瑜陀或优地亚，在曼谷以北七十公里，濒临湄南河，是十四世纪末泰国的都城。——译者

② 菩萨即金边西北菩萨省省会菩萨市；洛韦位于金边西北约六十公里；乌东位于金边之北约三十公里。——译者

罗门教的最后庇护所。诚然，柬埔寨早期某些国王是摩訶衍那（大乘）佛教的虔诚信徒。吴哥通王城里最奇特的巴容寺里的那些尖塔上的多面佛像，很可能就是将闍耶跋摩七世① 刻成菩萨（尚未得道的佛）② 的形象。闍耶跋摩八世在位期间，婆罗门教似乎又突然重占上风，随之而来的是大毁佛教神像。而达柴掌握政权，似乎不仅代表小乘佛教的正式兴起，同时也可能是柬埔寨历史上

①. 闍耶跋摩七世为闍耶跋摩八世的曾祖父，在位时间大约是1181——1215年。他曾一度征服占婆，大大地开辟了柬埔寨的疆土，并用十年的时间，役使了三十多万奴隶和民伕扩建吴哥通王城。吴哥通王城的城墙、城门、城中央的巴容寺以及许多其他寺院和建筑物，都是在他晚年建造的。他是大乘佛教的信奉者。——译者

②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有很大的不同。大乘佛教把释迦看作救世主，可以向他祈祷，并认为在成佛的道路上，有一个仅次于涅槃成道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有几位菩萨（尚未得道的佛），可以接引误入迷津的众生走上成佛的道路。小乘佛教则严峻朴素得多。目前流行于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锡兰的都是小乘佛教。在信仰小乘佛教的人看来，成佛的捷径是不存在的。释迦不过是早已涅槃成道的一位导师，他只是留下一些经典作为走向永生世界的指南。也没有什么菩萨，甚至寺庙里的佛像也不过是为了提醒人们不忘教主的伟大，并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小乘佛教认为，要想得到解脱，就要坐禅，行善，特别是遁世出家，而不是祈祷。由此可见，大乘教与帝王崇拜是很合拍的，帝王可以把自己扮作各种菩萨，小乘教则强调严峻朴素，与帝王崇拜以及建立壮丽的大寺庙不那么合拍。——作者

第一次为人民所欢迎的政变。

勒克累说："看来这场政变至少在城市里是为人民所欢迎的，因而是民主的，而新王为了收买人心，大概也放弃了一些王室的特权，诸如以强迫劳役大建寺庙，大修道路等等，……这些工程消耗了大量的财富，并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和极端的贫困。于是，当时正在建造的最后一个庙宇——吴哥窟就这样停了工，这可以从一些雕刻没有刻完这一情况得到证明。……再说，新教多半也不屑于完成旧教的工程，同时人民群众感到自己的力量逐渐强大，有更多的自由，也不肯再被强制征用。因此，在柬埔寨王权开始削弱的同时，柬埔寨的建筑学也随着衰退了。"各地方造反了，国王不得不答应给它们以自主权，于是各地方脱离中央与佛教革命同时发生了。

另外一位历史学家飞诺认为，柬埔寨的衰落是暹罗人入侵的直接结果："在柬埔寨，只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外国血统的有文化的贵族阶级，他们有如一层极薄的华丽的外表，复盖在广大的柬埔寨居民之上。虽然某些外国的入侵并不一定给予一种文明以致命的打击，可是它却完全可能消

灭社会中的上层人物，……特别是，如果在入侵之后，把大批俘虏带回本国（这在远东各国是司空见惯的），情况就尤其如此。毫无疑义，柬埔寨社会中这个有头脑的、孜孜不倦的阶层的消失，就是梵文突然从柬埔寨消失的主要原因。”

“至于一般老百姓，”飞诺接着写道，“我们没有理由断定他们对侵略者有什么强烈的反抗。说不定他们还会把这些侵略者当作救星来加以迎接。老实说，如果你考虑到这些老百姓不仅被强制为这些浩大的建筑工程——它们的浩大程度至今还使参观者惊叹不止——提供劳力，还要被迫为散布在整个帝国的无数寺庙提供差役和开支，……那你就丝毫不会怀疑，经过这样一个政权好几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广大劳动人民早已大量死亡，广泛破产了。广大劳动人民大概并不热心去保卫这些贪得无厌的大人物的事业，因为这些统治者不仅向人民勒索赋税，而且使许多人沦为奴隶。我们在这些寺庙中所看到的有计划的破坏痕迹，很可能就是出于那些怒不可遏的农民之手。”

“再说，外国胜利者向被征服的人民提供了

一种可贵的补偿：他们带来了一种温和的新宗教，其教义完全符合这些疲惫不堪、饱受摧残的人民的口味。这种朴实的宗教的僧侣都是苦行僧，只要有一间草棚栖身，有一把米果腹就心满意足；这种宗教的教旨向人民保证心灵安宁，社会安定。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棉（柬埔寨）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宗教，放下他们的光荣而沉重的负担，感到一身轻松。”

历史学家布里格斯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假想：柬埔寨人突然离开吴哥，是由于对婆罗门教的强烈的反感。他写道：“人民群众别无出路，只有逃亡。大多数人民群众突然持续不断地从王国的一侧向另一侧移动，说明了这次大移民的性质。这些传说中的女蛇神那伽的后代子孙，就象蛇蜕皮一样，把他们的令人生厌的往事抛在脑后，迁到一个遥远的地区去，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再受寺庙如林的恶梦的纠缠。在整个悠久而辉煌的吴哥时期，不论是战场上的厮杀场面，还是吴哥的长廊墙壁上雕刻出来的情景，都比不上其结束时期那样富于戏剧性。这一过程没有叙述在史册里，没有记载在碑文里，没有刻画在浮雕上，但

是它的含意是非常清楚的：首先是国王和那些幸存的社会名流，接着是老百姓，通通逃离了高棉文明的'伟大而光荣的首都'，就仿佛那里发生了瘟疫一样。”

这些说法是有趣的，但是没有任何根据。现存的证据表明，当这段时期的唯一可靠的记录者中国人周达观①于十三世纪末作为蒙古帝国使团的成员来到柬埔寨首都时，第一个信奉小乘教的柬埔寨王②还安然坐在吴哥通王城的王位上。当时柬埔寨刚刚经历了一次泰族人的灾难性的入侵。据周达观说，当时在位的君主是一个僭位者，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王位，是靠老王的女儿的帮助（据周达观说，她从她父亲那里把象征王权的圣剑偷了出来，交给她丈夫，使他得以为王）。周达观没有提到王权的衰落；相反地，却说国王拥有一支包括许多战象的强大的军队，并说王都看来依然非常富丽堂皇。那情景，就是在来自当时

① 周达观，元代温州人，曾于1296—1297年随元使赴柬埔寨，回国后著有《真腊风土记》，曾由法国伯希和（P. Pelliot）译成法语，为研究柬埔寨吴哥时期的重要文献。——译者

② 即因陀罗跋摩三世。——译者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客人的心目中，也是很了不起的。

据我们所知，柬埔寨在十五世纪中期曾遭受泰族人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在这次入侵中，吴哥肯定曾经被占领，甚至有一位暹罗王子登上了柬埔寨王位。但当时柬埔寨的军队依然相当强大，能够把入侵者赶走，收复了首都，再度巩固了边防。从东边来的占族人的入侵也三番五次被打退。1452年前后，大约在柬埔寨正式信奉小乘佛教一个半世纪以后，大概又有一个中国使团来到吴哥。[①] 关于这段时期，现在没有留下什么资料，因为现在没有这段时期的碑文，而王室所保存的许多档案，又在一百多年以后的1587年泰族人攻占并焚烧柬埔寨新王都洛韦时全部被毁。吴哥的衰落和放弃，可以从柬埔寨不断被泰族人战败和征服这件事得到解释，但是吴哥的城市和寺庙为什么会几乎完全湮没无闻，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大约从十五世纪起，才开始有了文字记载的

---

① 根据《明史》和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1452年是柬埔寨遣使至中国之年，不是中国遣使至吴哥之年。——译者

史书，但这时在柬埔寨人的意识中，连吴哥都不知道了。“从此以后，”勒克累写道，“一切重新开始，就仿佛这以前是黑夜，此后才是白天。关于过去的史实，完全湮没无闻。连国王的名字，王城的名字，以及历史上最突出的事件，都被人们忘记了。”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已经被大乘佛教的语言巴利文所代替。能够说明光荣的过去历史的碑铭已经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些显然刻有文字、能够向我们提供有关吴哥文明的资料的珍贵的石碑石柱，已经被推倒，被打碎，被抛进寺庙池塘的烂泥里。代替历史的只有一些传说，但柬埔寨的传说和泰族的传说几乎一模一样，无法区别，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不是可靠的史料来源。到了十六世纪，所有的档案全被焚毁，更把一切残存的史料毁得一干二净。尽管还有少数僧侣住在吴哥窟烧香拜佛，但另外的寺庙和古迹都被密林所包围，一度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繁荣的首都，深深埋没在热带植物之下，从此与世隔绝，没有人能够进去，并且几乎完全被人遗忘。

根据历史学家们收集到的一些不完整的和不

得要领的史实来看，皈依小乘佛教仿佛是造成柬埔寨国力衰微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小乘佛教也是征服者泰族人的宗教，因此这个因素也不见得是决定的因素。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建造寺庙的活动突然停顿下来，连石碑石柱也不凿不刻了，而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知识，主要是靠这些石碑石柱。此外，我们还知道，在柬埔寨发生了标志着它的历史转折点的那场宫廷政变以后，差不多有一百多年之久，吴哥仿佛依旧是柬埔寨的首都。没有证据表明它是被急遽放弃的。

不过，飞诺认为，泰族人的入侵“斩断”了柬埔寨的文化，加速它的衰落，这个意见倒不无可取之处。究竟是所有有文化的上层人物都被俘虏到泰国去了，还是有一部分残留下来，而在国王迁都金边时把他们带了过去，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象吴哥通王城这样一个城市，周围有这样复杂的灌溉网，要想使整个城市不陷于停顿，就需要大批称职的管理人员和熟练的技术人员。完全可能，在泰族人几番入侵之后，特别是在王廷放弃了这个城市以后，全城的公用事

业便停顿下来，灌溉渠道逐渐失修，寺庙无人照管，儿童没有地方上学，商业停滞，而且还可能发生了疫疠，因而整个城市不仅为泰族人重新入侵敞开了大门，而且也受到成群的盗匪的侵扰，于是剩下的居民就逐渐迁走。这个过程可能是经过了一、二百年才完成的。

吴哥并不是象某些旅游指南所说的那样，真是被人“重新发现”的。柬埔寨人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它的存在的，吴哥窟所保存的大量的近几百年的佛教文物足以证明，至少最大的寺庙并没有完全被人遗忘。吴哥通王城的存在是有人知道的，不过周围的一些寺庙，其中有一些规模相当大，总共占地达二百平方公里，确实是被人重新发现的。其中有一个寺庙（班迭斯雷寺），一直到1914年才被人重新发现。第一个把吴哥的消息传到外国的西方人，是一位法国博物学家，名叫亨利·穆奥。他听说有这么一座湮没的古城，决定于1860年前往参观。正如今天的参观者一样，他看到吴哥规模宏大，壮丽非凡，不禁叹为观止，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生气勃勃的文化的遗迹，这种文化在它的极盛时期，也就是在第十世

纪至十三世纪之间，足以同当时任何一种欧洲文化媲美而毫无逊色。

法国的科学家是有他们的贡献的：他们不仅把吴哥的艺术宝藏从热带丛林的环抱中发掘出来，而且把一些已经倒塌为一堆乱石的寺庙恢复原状。这项艰苦的工作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至今还没有完成。在这工作中，远东法国学校[①]不辞劳苦地把一些寺庙重建起来，其工程的复杂，简直难以想象。举例来说，巴容寺看起来不象一座庙宇，而象两座庙宇重叠在一起。要想体会这项工作的艰巨，你只消去看看达布隆寺就行了。达布隆寺是吴哥外围的大庙宇之一，至今基本上还保留着当初被发现时的样子，没有进行什么加工。从达布隆寺，你可以看到那些热带树木的树根如何深深扎进最小的石缝里，经过几个世纪的生长，可以使那些巨石崩裂，使高大的建筑物倒塌在地，埋没在纠缠不清的树干、树根、灌木和藤蔓之中。有些建筑物的历史和用途，至今还是考古学家中间争论的问题。

① 远东法国学校是法国殖民者于1898年设在河内的一个研究机构。——译者

二

吴哥帝国的回顾

尽管现在有相当多的资料提到吴哥时期的一些国王的名字，提到他们的家谱，他们进行过的战役，他们为自己建造的庙宇，然而关于当时的文艺和科学的资料，却没有保存下来——没有手写本，没有绘画，没有衣饰杂物，没有任何非宗教性的艺术品；即使是宗教性的艺术品，也只有用石头雕刻的那些。这是由于，在潮湿的热带气候中，任何用木材、羊皮纸、纤维制成的东西，早已化为乌有。在埃及这一类的地方，由于沙漠空气干燥，许多手写本、壁画以及各种文物，虽经几千年之久，还能保存下来。但在柬埔寨，即使是最坚硬的木材，也会被雨水、热带植物、昆虫、霉菌在几百年内腐蚀一空。今天，一个参观者穿过吴哥通王城的城门，站在城门口向那长达一

英里的大道望去，向标志着城市中心的巴容寺望去，他所看到的，只是一片密林。然而，今天这片密林，当年想必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城市，想必有宫殿、官府、娱乐场所、马厩、浴池、旅店、兵营，同时还有无数自由人和奴隶的住宅。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那座用木材建筑的王宫也无影无踪了，只剩下那华丽壮观的石雕台基。当年的王宫，就建在这个台基上。

然而现在残存下来的，已足令人十分惊叹。没有人知道古代高棉人用什么方法从五十英里以外的攷仑山把那些巨大的石块运到建筑工地，并把它们高高吊起，垒得整整齐齐，因为有些石块重达四吨。这一带的灌溉系统有两个人工水库，其中有一个宽一公里，长二公里。这个水库目前在美国援助之下，又用来修建一个现代的灌溉系统，这个灌溉系统基本上将按照五百多年以前高棉人的遗迹进行修建。关于柬埔寨的天文学，没有什么资料保留下来，但所有的庙宇都是丝毫不差地建在东西走向的轴线上。我们对于高棉的古代医学一无所知，仅仅根据达布隆寺内一个碑文上的记载，知道国王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时，柬埔寨有

一百零二所医院，而今天全柬埔寨只有十六所医院（自然今天柬埔寨的疆域比当时小得多）。至于各寺庙的用途，那就需要我们去苦心探讨，因为那些神殿里的神像早已被人毁掉或运走。

看样子，吴哥地区全部或差不多全部古迹都是柬埔寨国王们为他们自己建造的婆罗门教庙宇，因为吴哥所有的君主死后都被当作神来供奉，并取得神的谥号。大多数的神像都是国王的化身，有的化身为毗湿奴，有的化身为湿婆，有的化身为二者的结合体訶梨訶罗。① 看样子，这些庙宇既是国王的陵墓，又是国王受人祭祀的地方。国王死后，就要安排一些僧侣长期主持这些庙宇，并指定整村整村的人民供养这些僧侣。由于这些庙宇里所立的石碑石柱记载这些国王的事迹，吹嘘他们的功业，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知道他们打了那些胜仗，知道他们在几百年内最初如何在东部抵抗占族人的

① 毗湿奴(Vishnu)有人译作"幻惑天王"，湿婆(Shiva)有人译作"大自在天王"，都是婆罗门教的主神。诃梨诃罗(Harihara)则是二者的结合，因为诃梨(Hari)为毗湿奴的别名，诃罗(Hara)为湿婆的别名。诃梨诃罗的造像一半为毗湿奴，一半为湿婆。——译者

入侵，并把帝国向东扩大到占族人的国土，以及后来又如何在西部越来越无效地抵抗泰族人的入侵。柬埔寨帝国在其国力最盛时，它的疆域不仅包括今天的柬埔寨，而且包括交趾支那和安南，[1]包括老挝的大部分以及今天泰国的大部分，甚至还可能包括马来亚和缅甸的一部分。

幸而，关于高棉的古都，现在还保存着一部相当详细的记载，这部记载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官员写的。他在1295年[2]随中国的蒙古皇帝帖木儿大可汗所派遣的一个使团来到吴哥。帖木儿的父亲忽必烈可汗曾经打败缅甸，帮助泰族人脱离柬埔寨而独立。他曾鼓励安南向柬埔寨和占婆开战，并于1283年派了一支中国（亦即蒙古）

① 交趾支那(Cochinchina或Cochin-China)：十九世纪法帝国主义武力侵占整个越南后，于1884年将越南分成三个部分，以北部（北圻）为东京，中部（中圻）为安南，南部（南圻）为交趾支那，并定东京和安南为保护国，交趾支那为直属殖民地。——译者

② 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的总叙里说，他接到随元使赴柬埔寨的命令，是在元贞之乙未（1295年）6月，但第二年丙申（1296年）才从温州乘船出发，同年7月到达柬埔寨，至大德丁酉（1297年）6月动身回国。本书说他在1295年来到柬埔寨，在时间上有错误。——译者

小部队来到柬埔寨，强迫吴哥国王臣服中国。但是，用周达观的话来说，这支蒙古小部队“不返”。① 因此，这个使团的目的，是想从谈判中获得武力所未能获得的东西，即要求柬埔寨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看样子，谈判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不过进行了很久，使周达观有一整年的大好机会得以观察柬埔寨首都的生活。

根据周达观的描述，吴哥通王城各城门上的四方，各有佛头塔，这些塔今天还可以看到。但他说，各城门上的正中一塔“饰之以金”。他说，靠近王城中央有一座金塔，周围有石塔二十余座（大概就是巴容寺）。（巴容寺）东边有一座金桥，还有金狮子两头，分列于桥的左右；还有金佛八尊，列于石室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许，有铜塔一座……。”又说：“国宫、官舍、府第皆面东。……其正室之瓦以铅为之，余皆土瓦黄色。桥柱甚巨，皆雕画佛形。屋头壮观，修

① 此处在史实上有严重的错误。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总叙只是说：“唆都元帅之置省占城也，尝遣一虎符百户，一金牌千户同到本国，竟被拘执不返。”可见当时元朝仅仅派了两名武官作为使者到柬埔寨，并没有派遣什么“小部队”。——译者

廊复道突兀参差。”国王经常莅临的莅事处（现在称为“王台”）有金的窗棂。“左右方柱，上有镜约有四、五十面，列放于窗之旁。其下为象形（这些象形今天还可以看到）。闻内中多有奇处，防卫甚严，不可得而见也。”

在周达观停留吴哥期间，国王离开王宫共四、五次，因而周得以详尽地描述国王出门时的情景。由于怕人暗杀（须知这位国王大概是因陀罗跋摩三世，他逼走了老王，将太子投入狱中，改变了王廷的宗教），“新主身嵌圣铁，[1] 纵使刀箭之属，著体不能为害。”国王“头戴金冠子，……或有时不戴，但以线穿香花如茉莉之类，周匝于髻间。项上戴大珍珠三斤许。手足及诸指上皆带金镯、指展，[2] 上皆嵌猫儿眼睛石。[3] 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红药染赤色。出则手持金剑”（这柄金剑名叫孛赖·罕，至今仍是王权的象征）。国王“凡出时，……其前，……又有

① “身嵌圣铁”本书译为“Clad in armour”（“身穿铠甲”）。——译者

② “指展”即今天的戒指。——译者

③ 猫儿眼睛石是一种宝石。——译者

宫女，皆执内中金银器皿，及文饰之具。……。又有宫女，执标枪标牌为内兵，又成一队。又有羊车、马车，皆以金为饰。……，其销金凉伞何止百余。其后则是国主，立于象上，手持宝剑，象之牙亦以金套之。……。其四周拥簇之象甚多。又有军马护之。”

大官们，“丞相、将帅、司天等官”，出门皆乘轿，其出入仪从，亦有等级。品级最高的官员乘金轿，有四把金柄伞。其次者乘金轿，有一把金柄伞。品级最低的官员只有一把银柄伞。百人长佩银牌，千人长佩金牌。① 甚至有些和尚也按其地位乘金、银轿，用金、银柄伞。关于和尚的情况，也描述很详尽：他们“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寺亦许用瓦盖，中止有一像，正如释迦佛之状，呼为‘孛赖’。穿红，塑以泥，饰以丹青，外此别无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别，皆以铜铸成。……每日一斋，皆

① 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里只是说元朝曾派“一虎符百户”和“一金牌千户”出使柬埔寨，并没有说柬埔寨有“百人长佩银牌，千人长佩金牌”的官制。此处显然是作者的误解和附会。——译者

取办于斋主之家；寺中不设厨灶。所诵之经甚多，皆以贝叶[①]垒[②]成，极其齐整。于上写黑字，既不用笔墨，但不知其以何物书写。……国主有大政，亦咨访之。”

周达观报道了柬埔寨少数民族中有一部分中国人，他们都是商人，自己管理自己——和今天住在柬埔寨的少数民族中的中国人差不多。他还注意到一种相沿至今的风俗习惯，即国王亲自受理人民的申诉，“民间争讼，虽小事亦必上闻。”判断曲直，经常采用试罪裁判法（ordeal），[③]正如中世纪欧洲。刑罚很严，有罚金、鞭笞、斩去手指脚趾、活埋等。王廷还有一种怪俗，即每年要收取一坛子人胆，献给国王。胆囊被认为是胆量的器官。（其实，在英语里，gall这个词有时

① 贝叶是印度贝多树（棕榈科）的叶子，水沤后可以代纸，印度人多用以写经。——译者

② 疑为“叠”字之误。——译者

③ 试罪裁判法（ordeal）为古代条顿等民族所实行的一种裁判法，令被告将手插入火中或沸水中，或服毒药，倘若不受伤，便算无罪。周达观原文有如下的记载：“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为盗，不肯招认，遂以锅煎油极热，令此人伸手于中。若果偷物，则手腐烂，否则皮肉如故。云番人有法如此。”——译者

仍有“大胆”的意思。）胆汁是搀酒饮下，或用来浇洗国王御用大象的头。这种风俗，有些撰写印度支那其他国家——尤其是占婆——历史的人，均能证明其存在；据法国神父鲍耶沃说，一直到1850年，仍流行于柬埔寨。令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是，这些胆必须取自活人身上，因此每年到了“取胆季节”，在吴哥通王城夜间上街是不大安全的。至于柬埔寨的天文学，周达观提供的资料不多，只说王廷的司天能够推算日蚀和月蚀。写字的方法是用一种粉笔写在染黑的麂鹿皮上，并且象今天一样，是自左向右写的。奴隶制非常盛行，只有穷人才没有奴隶。

农业很发达。周达观提到每年大湖涨水，天然地把土壤更新一次，并说每年有三、四熟。他还报道了一种浮稻，随着水位的上涨，稻秆迅速长高，稻穗总是露出水面，有时高于地面达一丈。除了稻米外，有葱、芥菜、茄子、瓜、瓠、甘蔗、芋。果类有桔、石榴、桃、香蕉、荔枝、梅、杏，有些是野生的。① 制盐之法，同今天一

① 按《真腊风土记》谓当时柬埔寨没有桃、李、杏、梅，此处显系误解。——译者

样，是在海边蒸晒。酒是用糖、蜜、米或一种树叶酿制的。家畜有小马、绵羊、山羊、猪、鸡、鹅。在大湖里捕鱼是一项重要的生产。大蜥蜴、脚长八、九寸的龟、一斤以上的大虾，都列为食品。“鳄鱼大者如船，有四脚，绝类龙，特无角耳，肚甚脆美。”周达观所提到的野兽，有象、犀牛、虎、豹、熊、野牛、野马、鹿、野羊以及猿猴之类。此外还有许多种飞禽。柬埔寨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都没有狮子，然而狮子的图案对于纹章和装饰却很重要，在吴哥及其周围的庙宇里有许多石狮。因为柬埔寨人没有亲眼见过狮子，所以这些石狮都雕刻得奇形怪状。

当时普通柬埔寨人，正如今天一样，都住在茅草屋里，即使在王都附近也是如此。无论男女，甚至国王的后妃，衣服都很简单，只用一条缠腰布遮住下身。平时都是袒露着上身，打着赤脚。但即使是地位较低的人们，也戴着金戒指和金手镯。“男女身上，常涂香药，以檀、麝等香合成。”他们的房子，其规模之大小以及建筑用材，要看他们的地位而定。上等人家可以用瓦盖屋顶，普通老百姓只许用草盖，他们的性道德，

按照中国标准衡量，简直骇人听闻："每见人言番妇多淫，产后一两日，即与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即有……见弃之事。若丈夫适有远役，只可数夜。过十数夜，其妇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荡之心尤切。然亦闻有守志者。"同性恋爱之风似乎很盛。至于卫生设备方面，那些住宅当然没有下水道。周达观写道："每三两家共掘地为一坑，盖其草，满则填之，又别掘地为之。凡登溷① 既毕，必入池洗净。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饣。② 见唐人登厕用纸揩拭，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门。妇女亦有立而溺者。可笑，可笑。"

周达观描述了许多柬埔寨人的生活习惯，其中有关于照料分娩的风俗，以及周称之为"阵毯"的仪式，即当女孩子达到一定年龄时，给她破处女膜。这种风俗在占婆也有。"富室之女自七岁至九岁，至贫之家则止于十一岁，必命僧、道③ 去其童身，名曰'阵毯'。盖官司每发于中

① "登溷"即上厕所。——译者

② "饣"就是饭。——译者

③ 这里所说的"道"，大概指婆罗门教僧侣。——作者

国四月内，择一日颁行本国应有养女当'阵毯'之家，先行申报官司。官司先给巨烛一条，烛间刻画一处。约是夜遇昏点烛，至刻画处，则为'阵毯'时候矣。先期……，父母必择一僧或一道。随其何处寺观，往往自有主顾。向上好僧，皆为官户富室所先，贫者亦不暇择也。官富之家，馈以酒、米、布、帛、槟榔、银器之类。……随家丰俭。……亦有舍钱与贫女'阵毯'者，谓之做好事。① 盖一岁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许。"

讲到"阵毯"的实际仪式，周达观讲的就不那么有把握，不那么具体了。他叙述说："是夜大设饮食鼓乐，会亲邻。……既昏，以轿伞鼓乐迎此僧而归。以彩帛结二亭子，一则女坐其中，一则僧坐其中。不晓其口说何语，鼓乐之声喧阗。……闻至期与女俱入房，② 亲以手去其童，纳之酒中。或谓父母亲邻各点于额上，或者俱尝以口。或谓僧与女交媾之事，或谓无此。但不容唐人见

① 此处英译为："也有些和尚不接受银器为贫女'阵毯'的，谓之做好事。"是误译，兹据周达观原文改正。——译者

② 此处英译为："据说到了规定的时刻，和尚走进女孩子的彩亭里。"是误译，兹据周达观原文改正。——译者

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将明时，则又以轿伞鼓乐送僧去。后当以布帛之类与僧赎身，否则此女终为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适也。”

尽管周达观到达时，柬埔寨刚刚遭受暹罗人的进攻和蹂躏，但国家显然还是很繁荣，远未衰败。从现存少量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碑文中，也可看出当时疆土虽然有所缩小，但国家依然很强。边远省份和藩属是失掉了，但柬埔寨本土，尽管有时从西面遭到入侵，还是完整的。只不过那些浩大的工程已经停了下来。这个时期的文化，只是保存和重复旧有的文化，不再创新了。宗教也变得有利于比较平静的生活。由于国家收入减少，军队想必也没有那么庞大，那么补给良好了。

据大城王朝编年史，暹罗人在1350年侵入柬埔寨，俘虏了许多人回去，不过似乎没有攻下吴哥。但在1431年却攻下了这个城市；这一次，据大城王朝编年史说，战胜者抢走了许多尊佛像。暹罗王命他的儿子登上吴哥的王位，但不久这个新王便遭人暗杀，柬埔寨王位继承者奔哈·亚①收复了首都。看来，国王迁离吴哥，就在这多灾

① 奔哈·亚（Ponha Yat）大约即位于1432年。——译者

多难的时期。关于柬埔寨王都的市容和生活，自从周达观提供了他的简短而绚烂多彩的见闻一瞥之后，再也没有其他的记载。从此，一层黑暗的帷幕逐渐笼罩了吴哥和整个柬埔寨文化。

三

衰落和肢解

从放弃吴哥到沦为法国保护国，这中间的四百年，是柬埔寨逐步衰落的时期。只有了解几个世纪以来印度文明同中国文明在东南亚的长期冲突过程，才能从这个广阔的背景中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今天，柬埔寨是处在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界处，但一千年以前，它还是居于一个由许多印度化王国所形成的大弧形地带的中心。在这些印度化的王国中，实力最强的是爪哇，它曾一度征服柬埔寨。（据第十世纪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记载，柬埔寨有一位国王有一次冒冒失失地表示，他很想看到爪哇的摩訶罗闍① 的头放在一个盘子上摆在他面前。爪哇大君听说此事，很快地率领一支舰队驶上湄公河，乘柬埔寨国王不

① 摩诃罗阇（maharaja），意即大君。——译者

备，打败了他，将他斩首。回到爪哇后，把他的头腌在一个坛子里，送回柬埔寨，作为对敢于藐视爪哇霸权的人的警告。一直到吴哥王朝的奠基人阇耶跋摩二世，① 才把柬埔寨从爪哇的隶属下解放出来。）在柬埔寨的东面，在后来称为安南的印度支那沿海一带，还有一个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大国，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占婆。

占婆是世界上由于受到外国征服而完全消亡的国家之一。对于研究东南亚的学者来说，占婆的历史是非常有意思的。柬埔寨的运气比较好，它虽然受到两个强邻的不断蚕食和争夺，却由于这两个强邻相持不下，互相抵消，反而使柬埔寨能够生存下来。占婆的运气却没有这么好，它完全处于铁锤与铁砧之间。今天，由于法国学者的研究结果，尤其由于中国和安南史籍的存在，我们对于占婆的历史已经知道得很多。历史学家常常错误地断定，一个国家被消灭，一定是由于它已经没落了，再不然就是它不骁勇善战。所有的记载表明，占婆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国家，占族人

① 阇耶跋摩二世的在位时间大约是公元802—850年。——译者

精通印度文艺和科学，他们有伟大的领袖，他们吃苦耐劳，又格外勇猛善战。他们的败局是经历了几个世纪才形成的；他们经常打到遥远的北方，打进安南，一直打到中国边境，而且，即使被打得一败涂地，也三番五次地设法重振旗鼓，收复国土。但安南这个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国家，长期苦于人口过剩，不断向他们压过来，最后终于把他们消灭。

占婆是柬埔寨的屏障，它使柬埔寨免受安南人来自北方的压力，但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在柬埔寨人看来，当时居住在今天南越北半部的占族人是距离他们较近的冤家对头，因此经常同较远的、居住在今天北越的强国安南联合起来对付占族人。结果，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安南人不仅占据了占婆，而且最后涌进了人口稀少的柬埔寨东部，一个省接一个省地加以蚕食，逐渐把柬埔寨文化从当地排挤出去。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后来越来越快，到了十七、八世纪，安南把占婆消化完毕之后，便同泰国联合起来，大块大块地分割柬埔寨的国土。直到1700年为止，西贡还是柬埔寨的

一个村镇。事实上，今天称为交趾支那的地方，亦即南越的南半部，其居民从前全是柬埔寨人。但是今天，在交趾支那，柬埔寨人反而成了少数民族，“享有作为越南公民的全部权利”，但这样一来，连少数民族的地位也被剥夺了。

东南亚印度文明受到的压力，来自三个方面。在柬埔寨的西面，中国人（后来是蒙古人）对缅甸和暹罗不断加以紧逼。正如前面所说，泰族人从中国南部山区南下，涌进湄南河流域，吸收了印度文化，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挣脱了柬埔寨的羁縻，最后成为柬埔寨的征服者和占领者。在柬埔寨的东面，安南人从东京（即今越南北部）压过来，同占婆交战了几个世纪，最后吞并了占婆，并在后来成为南越主要部分的那片原来属于柬埔寨的国土上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在更远的南方，阿拉伯回教徒十三世纪出现于马六甲海峡。（马可孛罗是最早报道马来亚有回教徒的一个人。）爪哇帝国几经兴衰，十三世纪末遭到蒙古人的灾难性的海上入侵，丧失了对其他岛屿的控制，后来逐渐受回教文明的影响，到了今天，在印度尼西亚，旧日印度文化的最后立足点，只剩下一个

巴厘岛。就这样，前后不到几百年，一度作为东南亚印度文化中心的柬埔寨，便象今天这样，变成了抵挡中国文化潮流的前哨。

根据这一分析，柬埔寨历史的真正转折点，不应该是放弃吴哥的时候，而应该是1471年安南人给予柬埔寨的邻邦占婆王国以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候。距此不到三个世代以前，即1407年，占婆趁中国吞并安南的机会，收复了它所丧失的省份，包括在公元1000年前后被安南占去的旧首都因陀罗补罗。① 但到了1428年，安南再度摆脱了中国的统治，重新崛起的大越国（这时安南人自称大越）以加倍的凶猛进攻占婆，1446年攻入它的新首都毘闍耶；② 中间虽经占婆反攻，一度退却，终于在1471年进入占婆首都并加以占领。占族人曾多次向金边告急求援，但柬埔寨的统治者当时忙于内部的纷争（当时有两个对立的国王各自占据国土的一方），同时又忙于应付泰族人自西而来的威胁，无暇顾及东方邻国的生死存亡。

① 因陀罗补罗（Indrapura）在今越南广南省东阳废城。——译者

② 毘闍耶（Vijaya）又译阇槃，在今越南平定省。——译者

这样一来，安南人遂攻陷毘闍耶并将它摧毁，杀死了六万人，俘虏了三万人，其中包括占婆国王以及差不多全体王族。从此以后，占婆沦为苟延残喘于华列拉岬① 一带的一个小侯国，安南成了柬埔寨的邻邦，比旧日的占婆更加强大。

最初一段时期，柬埔寨还没有感觉到占婆被安南所灭的后果。柬埔寨国王安赞② 和他的儿子巴隆·拉嘉在十六世纪还多次打败泰族人，并没有因为安南这个强国在他们侧翼崛起而感到苦恼。安赞即位时，拒绝按照旧例向暹罗王进献白象，并在1510年暹罗人进犯时，大败暹罗人。1524年暹罗再次入侵时，又把它打得大败。安赞在洛韦建立了一个新首都，据说还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壮丽的王宫；但因为是用木材建的，现已无存。当缅甸人入侵暹罗并在1556年占领了暹罗首都大城府时，柬埔寨国王巴隆·拉嘉乘机于次年入侵暹罗。据柬埔寨编年史记载，他这次虏获了

---

① 华列拉岬（Cap Varella）在今越南富安省富乐至豪山一带。——译者

② 这里所说的国王安赞，即安赞一世（Ang Chan I），在位时间大约为1516—1566年。——译者

七万人，并收复了几省失地。1559年和1562年，巴隆·拉嘉两次进攻暹罗，均获胜。从这里再一次可以看出，吴哥陷落后，柬埔寨还远非一个衰败的国家。像占婆一样，它的衰落是逐步的，中间穿插着几段光荣的插曲。

1587年，暹罗人攻下了柬埔寨的首都洛韦，并将它焚毁。亨利·吕西耶认为，柬埔寨的衰落时期，应该从这时算起。至于造成这次灾难的原因，吕西耶举出继巴隆·拉嘉为王的索塔一世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索塔一世答应了暹罗人的求援，帮助暹罗人对抗缅甸人。1568年，暹罗在柬埔寨的援助下，赶走了缅甸入侵者，结果使暹罗对柬埔寨的威胁死灰复燃。第二个错误是索塔一世厌倦于当国王，宣布逊位，让他的八岁儿子吉·哲塔①嗣位为王，结果造成国家内部倾轧，给暹罗人提供了入侵的借口和机会。暹罗“以大军一十万人，象八百头，马一千八百五十匹”大举入侵，重新割去了柬埔寨西部各省，并长期围困洛韦。围兵最初虽然被击退，但终于攻

① 吉·哲塔即吉·哲塔一世（Chey Chettah I），大约于1576年嗣位。——译者

下王都。

柬埔寨有一个传说，认为洛韦之所以最后被攻陷，是由于暹罗人使用了一个诡计。暹罗人发现他们第一次入侵没有能够攻占柬埔寨的新首都，是由于有一片茂密的竹林保护着洛韦周围的木栅墙，于是他们从四面八方向城墙发射银制的子弹，故意让这些银弹打不到城墙而落进竹林里。随后，他们就撤围而去。柬埔寨人发现暹罗人的子弹是银制的，便出城去拾取；为了便于找到银弹，把护城的竹林全部砍光。这时暹罗军队去而复返，轻而易举地攻破木栅和胸墙，蜂拥入城，大事劫掠，而后将全城付之一炬。城内有一所宏伟的皇家图书馆，其中无疑收藏着吴哥时代以来的重要文物，也被焚毁，但尚有一部分珍贵艺术品和档案被入侵者劫至大城府，后来运到曼谷。

据柬埔寨的记载，柬埔寨国王当时设法逃到老挝。可是据泰国编年史说，暹罗王起兵之初，即发誓要“以柬埔寨王之血濯足”，至攻陷洛韦后，果然如愿以偿。这个屈辱的插曲至今仍使柬埔寨人感到痛心。直到1956年，有一家泰国报纸刊

登了一幅描绘暹罗王用战败的柬埔寨王的血洗脚的图画，柬埔寨各报还纷纷加以强烈的反对。

这次战争后嗣位的柬埔寨国王索里约波至1613年才举行加冕礼，这时他已经做了十三年国王了。从这件事不难推测，在这十三年里，柬埔寨是被泰族人占领着。索里约波逊位于他的儿子吉·哲塔二世。吉·哲塔二世与柬埔寨东面的新邻邦建立了友好关系，甚至娶了安南皇帝的女儿。他是第一个利用安南人反对暹罗人的柬埔寨国王。他依靠岳父的援助，两次击退暹罗企图重新占领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报答安南的援助，他不得不向安南让步，同意安南有权向西贡地区移民。吉·哲塔二世死于1625年，他的儿子奔哈·多尚未成年，由其叔父乌迭摄政。据勒克累引述柬埔寨编年史，年轻的奔哈·多与其叔父之妻偕逃，“出游吴哥窟”，被摄政王追获，与不贞之妇一同处决。引述这段插曲，主要是为了证明，吴哥虽然已被放弃为高棉的旧都，却并没有完全湮没无闻。

此后几位国王在位期间，大批从安南人迫害下逃入柬埔寨的占族难民成了棘手的问题，既危

及柬埔寨内部的安定，又伤害柬埔寨与邻国安南的关系。安南干涉了，暹罗起而效尤，于是出现了一段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柬埔寨有四、五个国王争夺王位，同时每个国王都试图召集人民去反对两个外国入侵者。最后，在王位的主要竞争者中，有一个（吉·哲塔四世）受到暹罗人的支持，另外一个（安依二世）受到安南人的支持。① 结果，有一段时期，国家陷于分裂状态，一个国王住在金边以北约二十英里的乌东，一个国王住在西贡。

安南人支持的国王受到中国的一些支持，曾分别于1683年、1684年、1689年和1691年四次入侵暹罗人支持的国王的国土（其疆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柬埔寨），但每次都被国王吉·哲塔四世的军队及其盟军（或者毋宁说是保护者）所击退。最后，吉·哲塔四世收复了所有被安南人控制的地区。1695年，吉·哲塔四世让位给他的侄儿，自己出家为僧。可是不久他侄儿便死了，他只好又复位。三年后，他又逊位了，这一次是

① 安依二世（Ang Non Ⅱ）于1674年即位，吉·哲塔四世（Chey Chettah Ⅳ）于次年即1675年即位。——译者

让位于他女婿安恩。但两年后安恩又逊位了，使吉·哲塔四世不得不第三次当国王。

王位三番四次的变动，使安南人认为有机可乘，再度入侵柬埔寨。这次入侵获得较大的成功。由于内部出卖，乌东陷落了，吉·哲塔四世被迫出走。但他纠集部队，最后总算赶走了入侵者。不过这次他没有能够恢复原有的疆界：安南不仅保留了西贡，而且保留了湄公河口附近的狭长地带，西至靠近今天柬埔寨与越南交界处的暹罗湾上的河仙。吉·哲塔四世再度挽救了国家之后，又让位给他的年仅十二岁的儿子托摩·拉嘉二世。可是，由于他儿子毕竟年幼，无法治理国家，吉·哲塔四世又一次回到王位。但过了四年，他终于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放弃了王冠和圣剑。

吉·哲塔四世大概是柬埔寨历史上最富于情趣的国王之一。他三番五次放弃王位，被人尊为"伟大的禅位王"。他的事迹使我们不禁想起一位现代的柬埔寨国王的行为。这位国王①为他的国家争取到独立地位以后，即逊位担任首相，此

① "这位国王"指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译者

后两次辞职，两次重任首相，最后一次担任首相后，差不多马上又辞职了。假如近世的经验可以作为了解古史的向导的话，那么，吉·哲塔四世几次放弃王位以及几次复位，并不一定表明他无条件地希望摆脱国王的职责。相反地，这也可能表明他对权力的态度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很想摆脱它；另一方面，又相信（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只有自己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保卫国家的利益而使之不受外国的侵犯。我们不妨臆测，除了国王吉·哲塔四世当政时期外，（虽然他在退居寺院的时候也可能继续掌着国家的大权），柬埔寨的朝廷很可能由于争权夺利、朋党倾轧、颟顸无能以及贪污腐败而四分五裂，致使政府陷于瘫痪。

到了十八世纪末，柬埔寨的疆域同最初放弃吴哥时相比较，只剩一半左右。如果把这段时期内历次改朝换代、外国入侵、反入侵、内部叛乱、对外臣服等等一一加以缕述，那是没有多大裨益的。1767年，缅甸人再一次攻占并劫掠了泰国的大城府，给安南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之所以没有完全吞并柬埔寨，仅仅由

于安南国内这时恰好发生了西山叛乱。① 尽管这样，到了1800年，安南已经兼并了整个交趾支那，并使越南人在那里定居下来；除了越南人外，这时又增加了逃避满族人统治的中国人。暹罗人恢复国力后，柬埔寨的国王们不得不到曼谷去加冕；但这件事招致了安南人更大的敌视，于是有一段时期，柬埔寨的国王们不得不向安南和暹罗同时纳贡。

十九世纪初，国王安赞② 反抗暹罗人，逃至西贡。安南皇帝嘉隆③ 派他率领一支安南军队回到柬埔寨，打败暹罗人。但是，正象当年安南人被吉·哲塔四世打败后攫取西贡作为"补偿"一样，现在暹罗人被安赞打败，也从柬埔寨占去马

① 这里所说的"西山叛乱"(the Tay—Son Rebellion)，即越南历史上著名的西山农民起义。起义军首先发难于一个名叫西山的庄园（即怀仁府安溪村），先后推翻了南方的阮氏王朝，粉碎了暹罗和清朝的军事干涉，消灭了北方的郑氏封建集团。后因起义军领导阶层内部倾轧，又由于阮氏封建集团余孽阮福映勾结法国殖民者进行镇压，终于失败。——译者

② 此安赞王（1802——1834）与十六世纪初即位的安赞王同名。——译者

③ 嘉隆即阮福映，于1802年勾结法国人打败西山起义军后，在顺化即位，号嘉隆帝。——译者

德望、诗梳风、吴哥各省。柬埔寨在外国支援下所获得的胜利，至多使柬埔寨不致名实俱亡而已，这是由于它的两个强邻谁都不愿意对方把国界推进得太靠近自己。不久，暹罗人再一次入侵，横扫整个柬埔寨，一直打到交趾支那，后来安南人进行反攻，又把暹罗人赶回本国。

于是，安南人于1833年扶安赞王复位，并留下一支占领军，由张明讲将军统率。次年，柬埔寨国王安赞去世，安南人立其女安眉嗣位。从她的越语称号ba—công—chua（公主娘娘）不难看出，她甚至在名义上也不是女王。许多人认为她是张将军的“sahay”（“情妇”）。张将军用严刑峻法统治柬埔寨，给柬埔寨各省换上越南化的命名，并在各省推行安南制度，甚至连乌东王廷的达官贵人的服装和发式，也得改为越南式样。柬埔寨的王权跌落到最低点，昔日征服占婆的安南人，现在成了柬埔寨的征服者。中国文化的巨澜，大有吞没吴哥的后代子孙之势。

正当安南准备这样消化柬埔寨的半壁河山的时候，有两个觊觎王位的亲王依然留在暹罗人占据的柬埔寨领土上。他们是已故国王安赞的两个

兄弟：安恩①和安东。安南人设法引诱安恩至菩萨城。菩萨城的人民立即把他当作救星来欢迎。也许因为安南人认为这种热烈的欢迎不是好兆头，也许因为这完全是他们的预谋，安南人当即逮捕安恩，把他押送到西贡。这时柬埔寨的气氛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随后不久，那位安南将军又决定把女王本人和她的主要近臣转移到西贡。

奇怪的是，这些消息居然飞快地传遍整个柬埔寨的半壁河山。那些佛教僧侣们，眼看他们的宗教要被安南征服者所灭绝，纷纷出来协助组织抵抗运动。1842 年，在大家约定的日子，起义爆发了，于是柬埔寨人见到安南人就杀。没有人知道这次起义的首领是什么人，只知道这次起义是希望从暹罗接回安东，奉他为新王。八天之内，在整个柬埔寨，许多小股的起义者切断了全部交通线，消灭了那些孤立的驻防军据点，围困了安南人尚在坚守的城市。全国成立了许多革命公会，重要人物们聚集在一起，写了一份请愿书给泰国国王，请求他干预柬埔寨的事情，立安东

① 此安恩亲王与十八世纪初即位的国王安恩同名。——译者

亲王为君。暹罗人很快就采取行动，派出两支军队，一支从陆路来，一支从海上来。

紧跟着这个插曲而发生的战事——几次战役的胜负情况，暹罗湾的海战，乌东包围战的波折变化——在今天已经不那么使人感兴趣。但是，1842年柬埔寨革命的几点基本教训，却依然耐人寻味。首先，这是一场自发的群众性的革命，它是由普普通通的人组织起来的，并得到分布在各地的通讯员的紧密配合，把农民们的行动统一起来。这些农民（正象今天的柬埔寨农民一样）表面上看来好象性情温顺，头脑迟钝，没有什么知识，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是祖国存亡的关键时刻，起而响应祖国的号召。到了战事的最后一刻，当一支安南生力军攻克了金边，逼近乌东，眼看大势已去的时候，赢得胜利的不是暹罗军队，而是一支不知从哪里来的农民游击队。他们击溃了安南军队，杀死了安南将军。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教训是，当柬埔寨人民在安南人的占领和暹罗人的占领这两者之间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时，他们宁愿选择后者。直到今天，柬埔寨人固然非常不信任他们的亲戚暹罗

人，但更加仇恨和畏惧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的越南人。除了人种、语言、宗教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外，在征服的形式上也有差异。安南人在柬埔寨土地上实行移民，把柬埔寨农民赶走，再不然就是百般骚扰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土地。而暹罗人呢，虽然他们吞并或占领柬埔寨大片国土，却不向这些地方派送移民。相反地，他们阻止农民离开土地。因此，许多年以后，当柬埔寨在法国的援助下同暹罗恢复力量均衡时，它依旧有理由收回这些省份。

1847年，安东王根据暹罗和安南的协议，举行加冕礼。这个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安南人所支持的觊觎王位的安恩亲王恰好于此时死去。被拘留在西贡和曼谷的一些王室成员均被放回，落入安南人手中的圣剑也归还了——这柄圣剑目前供奉在乌东的一座特设的楼阁里。实际上，安东的即位与其说恢复了柬埔寨的主权，不如说在安南的同意下恢复了暹罗的支配权，而其代价是柬埔寨不仅要承认暹罗的宗主权，同时还要承认安南的宗主权。虽然看来仿佛暹罗占了上风（安东1848年任命一位首相，还得征求曼谷同

意，其从属程度之深，于此可见），但安南人还是不放松他们的压力，特别是，柬埔寨与外国的商业往来全靠湄公河上的运输，而安南人竟将这条交通线逐渐切断。

由于饱受七年多的战争蹂躏，柬埔寨在经济上已是一蹶不振了。加上首都发生瘟疫，又死了许多人。尽管安东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力图复兴国家，但显而易见，他完全处于泰国和安南的摆布之下。而且，如果再发生一次战争，他的国家最后一定要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考虑从那些新近在远东表现出实力的欧洲国家中寻求保护。他选中了法国。①

① 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玩弄欺骗手段和实行炮舰政策的结果〔参看威·贝却敌(W·Burchett)著《沿湄公河而上》(《Mekong Upstream》)中译本66—6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北京〕。本书作者说安东王自愿寻求法国保护，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是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辩护。——译者

四

法国保护国

当然，安东王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法国强加于柬埔寨的那种保护制度。他所想到的只是，他给予法国某些贸易上的特权，法国则保证他的国家的独立。他派了一位大臣到新加坡去，向那里的法国领事建议订立这样一项条约。但是，当这位法国领事后来派遣一个秘密使者来到柬埔寨时，事情被暹罗国王知道了。他威胁安东王说，如果他同法国签订什么条约，就要对他开战。假如不是法国在1859年打败安南人，占据了交趾支那（即西南与柬埔寨接壤的越南南部），暹罗对柬埔寨的支配权还会这样继续下去。安东王没有看到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便在1859年死了，由他的儿子诺罗敦继位。但没等到诺罗敦举行加冕礼，国内就发生了叛乱，使他不得不逃

走。他先逃到暹罗人占据的马德望，后来又带着王室宝器——王冠、圣剑和玉玺逃到曼谷。1862年，诺罗敦在暹罗军队护送下回到柬埔寨，收复了乌东，在那里即位为王。但暹罗人为了慎重起见，拒绝把他的宝器送还给他，说要等到局势安定以后再说。

因此，诺罗敦王的地位是很虚弱的，尤其是法国在西贡窝藏着发动1860年叛乱的觊觎柬埔寨王位的西伏塔亲王，这就使他的地位更加虚弱。此外，作为安南的继承者，法国完全可以要求和暹罗一样拥有对柬埔寨的宗主权。好几个法国代表曾以相当客气的方式向柬埔寨强调这一点，表示法国人可以保护柬埔寨不受暹罗的欺凌。最后，1863年，西贡派来一位法国特使，这位特使就是现在已经很有名气的戴拉格里海军中校。他向柬埔寨国王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法兰西皇帝建议把自己从安南皇帝继承下来的对柬埔寨的宗主权“改变”为保护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法国将向柬埔寨国王派遣一个留守使，同时，柬埔寨必须同意，没有法国的许可，不得接受其他国家派遣领事。法国公民有权在柬埔寨自由定居，

柬埔寨人也有对等的权利在法兰西帝国其他地区定居。作为交换条件，法国不仅保证柬埔寨不受外国进攻，而且还要负责“在王国内部维持秩序和和平”——言外之意，即法国将抛弃诺罗敦王的竞争者西伏塔亲王。条约草案还规定法国货物进入柬埔寨免税。法国人之间的争端由治外法庭审理，法国人与柬埔寨人之间的诉讼案由双方人员参加的会审法庭审理。

诺罗敦这时只有两种抉择，要么亡于暹罗人之手，要么接受法国人提出的这种保护。面对着这两种抉择，诺罗敦选择了后者，在保护条约上签了字；但条约还需要先送到巴黎由拿破仑三世批准。在这期间，暹罗从外交上对柬埔寨大施压力。暹罗王不仅以战争相威胁，而且要求柬埔寨注意到，他可以无限期地扣留当时寄存在曼谷的王室宝器。在这些威胁面前，诺罗敦同暹罗签订了一项密约，承认暹罗对柬埔寨的宗主权，并永远割让那些处于暹罗占领下的省份。但是，等到拿破仑三世批准的柬法条约从巴黎送回以后，法国立即向暹罗施加压力，终于使暹罗送还王室宝器。于是，1864 年，诺罗敦遂用法国人替他取

回的王冠加冕，而且，这项王冠实际上也是由新任法国留守使在加冕仪式中当场交给他的。这时暹罗在名义上仍旧保留宗主权，在加冕时由一位大使代表暹罗莅临，但在仪式完毕后，立即被劝说离开柬埔寨。因此，法国对柬埔寨的支配权，可以说开始于诺罗敦加冕之日。

诺罗敦王起初并不是法国的傀儡，但后来终于成了法国的傀儡。他当政时所建立的法国保护制度受到柬埔寨人民的强烈反对。从1866年至1867年，以及从1885年至1887年，都爆发过叛乱，[①]但这些叛乱最后都由法国军队帮助柬埔寨军队——当时由国王的兄弟西索瓦亲王率领——平定下去了。这时国家出现了意见分歧。凡是反对法国人的行动均意味着对国王的不忠，而国王又是国家存在的象征。人们仇恨法国人，但只要朝廷一天袒护法国人，法国就可以相当容易地控制这个国家。

① 这两次“叛乱”都是柬埔寨农民和僧侣的抗法武装起义。领导1866—1867年的起义的，是爱国王族阿卡·索亚亲王(Prince Achar Soa)；领导1885—1887年的起义的，是诺罗敦国王的兄弟西伏塔亲王(Prince Sivotha)。——译者

第一次叛乱平定下去后，法国便着手与暹罗调整关系，因为暹罗曾经很自然地支持过叛军。法、暹两国商订了一项条约，使暹罗王放弃“柬埔寨国王对他本人和他的继承人进贡、献礼，或其他表示藩属地位的事项”。作为交换条件，法兰西皇帝答应不把柬埔寨并入业已成为法国殖民地的交趾支那，并承认暹罗正式占有暹粒、马德望、诗梳风诸省。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法国后来又同暹罗商订一些新约，使这几省归还柬埔寨。

1884年，诺罗敦国王又被迫签署了另一项条约，让法国控制了柬埔寨的内政，从而使柬埔寨成了事实上的法国殖民地。根据这一条约，国王保证“实行法国政府认为符合保护国利益的一切有关行政、司法、财政及商业方面的必要的改革”。结果，柬埔寨的全部行政部门均置于法国留守使的控制之下。法国人掌管了海关、税务、邮政、农业、林业、卫生、兽医等部门，同时还掌管了柬埔寨的教育系统。各省省会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城市都设了驻劄官和副驻劄官，所有当地公务员都通过一位有名无实的柬埔寨官吏向他们负责。法国军队早已进驻柬埔寨国内，这时法国

人又掌握了警察。保护国与殖民地的唯一区别，实质上就是君主制度，国王在名义上依然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法国留守使是国王的“顾问”，但他有权直接同国王会面，国王必须接受他的意见。

柬埔寨沦为法国保护国差不多达九十年，要想对法国的保护制度进行全面的评价是困难的，因为它有许多积极方面，也有许多消极方面，而且不同的观察者对这些积极和消极方面的评价又有所不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我们将在下面缕述保护制度的成就和缺点。

在积极方面，毫无疑义，保护国制度使柬埔寨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下来。假如不是法国保护，柬埔寨最后一定要被暹罗所吞并——老实说，假如不是法国占领了交趾支那，柬埔寨早已被安南所吞并，再不然就是被安南和暹罗所瓜分。作为积极方面的第二点，我们必须提到各沦陷省份的收复。上面已经讲过，法国在1867年的条约中虽然承认暹罗占有这些省份，但并没有妨碍法国后来对暹罗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它归还边

界各省。通过1904年的条约和1907年的另一条约，法国争回马德望、诗梳风、暹粒各省，同时也争回柬埔寨东北部被暹罗占领的某些领土，并把所有这些地区重新并入柬埔寨。假如不是法国人，柬埔寨西部的大片产米区以及吴哥废墟今天早已划入泰国的边远省份。此外，在积极方面，还应该提到法国科学家通过修复和解释吴哥的古代文物，在考查和重新发现柬埔寨古代文明的繁荣方面做了不少出色的工作。柬埔寨能够知道自己的庄严伟大的历史，也应该归功于法国的保护机构。

法国人提高君主制度的威望的政策，也值得赞扬，这种君主制度今天已成为国家统一和国家稳定的关键因素。固然，法国人利用柬埔寨人民对国王的忠诚而对他们进行统治；只要人民忠于国王，而国王又被法国人所控制，法国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统治这个国家。但是，在评价法国统治的积极和消极方面时，不应当区分有意的和无意的好处和缺点。事实上，由于法国人的政策，柬埔寨国王们才维持了他们的威望，维系了臣民对他们的忠心，这一点也应列为一项出色的成

绩。法国人煞费苦心地保持和尊重国王的雍容华贵的全副仪表。1867年首都从乌东迁回金边后，有一段时期，国王所住的王宫同法国留守使官邸比较起来，未免相形见绌，但这一点后来得到了纠正。我们今天在金边观赏到的那座纯柬埔寨式的美丽的王宫，有着长而弯的线条，多层的人字形的屋顶，传统的装饰物，琳琅满目的壁上雕绘，是由一位法国建筑师设计并由法国在1915年建筑起来的。

法国保护当局削弱王室——尽管它的威望在外表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一个有效手法，是操纵王位的继承。法国留守使不让诺罗敦的儿子们继承王位，却向王位委员会建议，让已故国王的弟弟，曾经卖力帮助法国人平定两次叛乱的西索瓦继承王位。西索瓦在位的时期是从1904年至1927年，他对法国忠顺到无以复加，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征募柬埔寨人参加法国军队在欧洲作战。（1956年担任柬埔寨首相的钦迪就曾经在1918年在法国军队里当过班长。）继承西索瓦为王的是西索瓦的儿子莫尼旺。这样，莫尼旺的即位就使王室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支系：诺

罗敦一系和西索瓦一系。

国王们过着安闲舒适的生活，除了醉心于艺术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人心目中近乎贪恋酒色，但实际上是柬埔寨国王的理所当然的行径。诺罗敦国王仍然有二百个左右的后妃，其他嫔从无数。西索瓦这一系比较不富裕（因为诺罗敦把财产传给他的几个儿子），因而更加依赖法国人，但家庭生活还是很豪华。莫尼旺国王仍然有五十个左右的后妃，其他嫔从无数。充当王室舞蹈团的成员被认为是一件极其光彩的事，莫尼旺在世之日，所有那些舞女都是国王的妃嫔。

莫尼旺国王1941年去世后，法国人碰到一个困难问题需要解决。国王的长子莫尼雷特亲王似乎在思想上过于独立不羁（而事实上，他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国家独立的），于是法国留守使运用他的决定性的影响力，为王室中一位比较年轻的成员取得王位，这位比较年轻的成员便是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恰好有一个长处，就是出身于王室的两个支系——他父亲属于诺罗敦一系，他母亲属于西索瓦一系。在法国人看来，西哈努克性格比较柔顺，意志比较薄弱，为人比较随

和。现在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当时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法国保护制度的积极方面，还应该提到废除奴隶制度，严格划清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机关是“諮询性的”，是无关紧要的），以及建立一套公正不倚的司法制度，这种司法制度至今尚为柬埔寨人缅怀不忘。通过加强村长（Mekhums）制，赋予村长以广泛的权力，改善了民政。成立了几所医院。建立了相当好的公路网。修建了一条铁路从金边通到马德望，再由马德望通到泰国边境。在金边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内河码头。此外，还应指出首都和各省的城市设计，也是成就之一。

在经济上，这个国家没有得到多少开发，只创办了一些橡胶园。这些橡胶园是法国人利用外国劳动力建立起来的国中之国，它们对柬埔寨的经济没有什么贡献，但也没有榨干柬埔寨的资源。经济发展固然不够，但也没有类似荷属东印度等地的那种贪得无厌的殖民主义。在法国人统治下，柬埔寨是一个穷乡僻壤，一个后方地区，一个前娘生的孩子。法国的失败，与其说由于剥

削，倒不如说由于玩忽失职。①

法国最大的玩忽之罪是在教育部门。假如柬埔寨有一个高级知识阶层，他们本来可以有志于国家的高级行政职务，可是法国在柬埔寨所提供的那种教育，远未达到大学预科阶段。直到1935年，才成立一所高级中学，但到了1939年，这个学校的高中毕业生（“bacheliers”）只有四名。不消说，柬埔寨没有高等学校；而且，法国人还百般阻挠柬埔寨人到法国去进高等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一个柬埔寨人在法国获得医师学位，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学位，还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军队，并在战后留在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柬埔寨

① 柬埔寨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法国殖民者对柬埔寨进行了近达一世纪的残酷的榨取与奴役。法国殖民者不仅疯狂掠夺柬埔寨大量肥沃的土地（例如，仅一家法国公司就独占了二万二千三百多公顷的橡胶园），还通过各种苛捐杂税、物资掠夺、贸易垄断、银行借贷、货币发行等等，进行剥削。例如，法国资本家在柬埔寨的三大橡胶公司——桔井种植公司、柬埔寨公司和磅同橡胶公司在1951年就获得九亿六千六百多万法郎的巨额利润。作者在这里说柬埔寨经济不发展，不是由于法国殖民者的剥削，而主要是由于法国殖民者“玩忽失职”，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为法国殖民者开脱罪行。——译者

唯一的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松·旺塞（目前主管国营铁路），就是这位医师的儿子。这位医师由于曾经住在法国，所以能够克服种种困难，送他儿子到法国上学。没有一个柬埔寨人有机会学建筑学，也没有一个柬埔寨人受到培养而能够担任农业、邮政、公共工程等等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作。由于偶然的原因，柬埔寨有一个人由家庭送到巴黎高等商业学院去学习，这个人就是松山。因此，1954年柬埔寨成立国家银行时，他才有资格担任行长。受过训练的行政人才之缺乏，简直骇人听闻。

一直到保护国时期的最后阶段，河内的印度支那大学才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但从那里毕业的不是医师，而是“医士”（“médecins”），而且就柬埔寨籍的毕业生来说，为数不到三十人，按比例远远少于越南人。至于教师，成绩就更糟了。在河内学教育学的只有三个柬埔寨人，在法国学习的一个也没有。由于没有培养柬埔寨人教高中，所以差不多所有教师均由法国提供。直到目前，柬埔寨大部分高中教育都依靠法国教师。全部初级小学教育都交给佛教寺庙去办。国立初

级小学只有一百零七所（今天有九百所），而且，奇怪的是，娃娃们从第一学年起就得学习法语。教育的金字塔很快就变成针状的东西。

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法国人统治时期和柬埔寨现政权之间在教育方面的对比情况。1938—1939年度，国立初级小学有一万三千三百名左右的学生；1955—1956年度，有十九万五千一百名。在高一级的学校中，即高级小学（“école complémentaire”）中，1938—1939年度有三千二百名，1955—1956年度有五万七千一百名。1938—1939年度，只毕业了二百三十八名柬埔寨小学教师；1955—1956年度，小学教师是七千一百四十六名，还不算由速成班（办速成班依然满足不了需要）培养出来的一千零六十名教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柬埔寨的预算用于教育事业的还不到百分之八。而今天，比例已超过百分之二十，还不算外国的援助。尽管今天已做了巨大的努力，但柬埔寨要想获得足够的办好政府各部门所急需的各方面的专家，大约还需要三十年。

为了公平起见，也应该提一提法国人对教育问题的答辩。答辩是：在保护国时期，柬埔寨人

对高等教育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学童们喜欢传统的寺庙学校而不喜欢新式小学，要想叫他们上新式小学，要费很大的努力；总之，教育的供应似乎完全满足了需求。至于培养医师方面，他们说，鉴于柬埔寨人不大愿意用欧洲的方法治病，法国人开设的一些药房已完全足够满足需要。

这些理由就其本身来说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应指出，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不怎么急迫，是因为柬埔寨青年们知道，他们在国内没有发展的前途；学童们不愿意上法国人办的小学，是因为这些小学是法国人办的；高中学生不肯努力学习，是因为毕业太困难；居民不愿意找西医，是因为没有人把西医的好处告诉他们。

直到今天，柬埔寨的高中课程还是强调学习法国史，而且所有的学科（除了柬埔寨语外）都用法语教学，这真是个怪现象。不过，同时也应该指出，尽管初级小学的娃娃们很快就把他们头三年中（他们的全部就学时期一般只有这么久）所学到的一点法语忘得干干净净，但成千的其他柬埔寨人，却多亏懂得法语，才能够同外国交往——当保护制度宣告结束，这种交往成为可能的

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在法国人统治下，存在着一个名为“印度支那联邦”的政治实体。这是一个人为的产物，包括越南（东京、安南、交趾支那）、柬埔寨、老挝。这个极不正常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完全出于法国的强迫命令；法国人一走，它就不复存在了。印度支那联邦的首府是河内和西贡，因而按照常理——假如这种不自然的结合还有什么常理可言的话——海关、货币以及文化和行政部门当然也就集中在越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里。这对柬埔寨有一种极其恶劣的影响。柬埔寨的税收被转移到越南去维持那边的业务机构，柬埔寨根本没有海关和货币机关；全部贸易由西贡转口，而且一般由那边供给资金并加以控制。更糟的是，由于在河内和西贡各部门任职的受过训练的越南办事人员熟悉整个印度支那的行政管理，在柬埔寨的法国人自然情愿随身带来他们的越南助手，而不愿意去训练教育程度不高的柬埔寨人干这些工作。

这样做的结果，使柬埔寨人更加处于劣势，并使大批外国人越过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名义上

的国界流入柬埔寨。今天，法国人带来的越南行政管理人员已经离开柬埔寨，可是还遗留下三十万名左右的其他越南移民以及法国人带来的或允许入境的二十五万名左右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他们在柬埔寨定居的结果，使绝大部分商业掌握在他们手里。今天，柬埔寨政府拚命设法改变这种局面，企图至少使一部分经济权操在柬埔寨人手里，但仅获得部分的成功。

事实上，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奇怪的不利因素，这种不利因素来自柬埔寨社会的相对平均主义性质。柬埔寨的社会很单纯，从来没有大地主，所有的土地均归国王所有。只有一个人数不多的达官贵人阶级勉强称得上富裕。这种田园诗般的情况对柬埔寨很不利：在越南，有许多富商和大地主，他们不仅把儿子送到法国去学习，而且他们本人也逐渐介入生产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可是在柬埔寨，却没有几个柬埔寨本地人有多少资财可以用来投资或用来产生社会政治影响。今天，最富裕的、最有进取心的、最有才能的是华人，他们控制着进口贸易、银行业、碾米业、借贷业、公共汽车运输业以及几乎所有货物

的零批业务。这是保护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它对柬埔寨人的未来充满了危险的预兆。

五

走向独立之路

挣脱法国的统治，争取柬埔寨独立的斗争，是由山玉成[1]这个爱国者发动的。他今天过着潦倒的流亡生涯。虽然他的旧部下对他缅怀不忘，但诺罗敦·西哈努克——真正赢得柬埔寨独立的国王（现在是亲王），对他则深恶痛绝，斥他为卖国贼。这两人之间错综的争端，是柬埔寨的自由斗争史，其中有绚丽的一面，也有悲剧的一面。重要的是，这是有争议的历史，其中双方均有不少是非曲直有待发现。谁也不能期望不得罪一方

① 山玉成（Son Ngoc Thanh）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曾

或双方，就能叙述这段历史。

山玉成于1936年创办第一家柬埔寨文报纸《那加拉哇塔》报（意即《吴哥窟》）。他选择这个报名，是为了唤起人们怀念柬埔寨过去的伟大。《那加拉哇塔》报奉行反对法国的方针。这个方针获得了小知识阶层中的青年人和一些佛教僧侣的同情，前者由于在政治上受到排斥而感到失望，后者由于西方生活方式的输入带来他们往日赫赫声誉的下降而不满。1941年法国战败①和日本人占领柬埔寨，使得这种反对法国的倾向大为加强。尽管日本人让法国保留民政管理权，但却允许泰国收回法国在1904年和1907年间从泰国手中夺回的柬埔寨的西部省份。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人理所当然地要问问自己：法国的保护制度究竟有什么价值？法国统治者非但不能保护柬埔寨，反而成了日本人的无能的傀儡。

① 此处文意不清。如指法国在欧洲战败，时间是在1940年6月；如指法国在印度支那战败，则不符史实，因1941年7月日本侵入柬埔寨时，并未遇到法国人的抵抗。——译者

1942年，山玉成起兵反抗法国人，但被法国警察残酷镇压下去了。他本来期望得到日本的支持，结果却落了空，他只得溜之大吉。和他一同起兵的两个主要伙伴伯克钟与和尚兴昭被捕了。山玉成本人获准在日本避难。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和日本在战争中不断失利，正如在整个印度支那一样，在柬埔寨的法国人变得强硬起来，准备反击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发觉了法国人的计划，于是在1945年3月9日解除了印度支那全境法军的武装，并将法国战俘拘禁在战俘营。两天之后，即3月11日，保大皇帝[①]宣告越南独立。3月16日，年轻的西哈努克国王也宣告柬埔寨独立。因此，日本人便把山玉成带回柬埔寨，于6月1日任命他为外交大臣。两个月之后，山玉成下令逮捕其他几位部长，自己当了柬埔寨第一任首相。他的内阁包括伯克钟。伯克钟在日本

① 保大(Bao Dai)原名阮永瑞，是越南阮氏封建王朝的第十三代皇帝。1945年3月9日，日军解除印度支那全境法军的武装。3月11日，保大宣布所谓“独立”，声明废除“安南帝国”以及与法国所签订的保护国条约，成立了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译者

人把他从法国监狱中释放之后，又将《那加拉哇塔》报复刊出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柬埔寨的爱国者手下没有任何军队以反对法国人卷土重来。山玉成宣布要保持柬埔寨的独立，并于9月组织了一次公民投票，以巩固他自己的地位。这次公民投票的结果，山玉成的独立政府以压倒的多数票获得人民的支持。但是，同他所期望的相反，盟军占领当局不允许他利用这次人民的支持作为他讨价还价的资本。在勒克莱克将军①的要求下，十七度线以南的印度支那盟军司令英国旅长慕雷，于10月将山玉成逮捕，送至西贡的法国监狱，又从西贡把他流放到法国。不久法兰西共和国一个高级专员到达金边，西哈努克国王签署一项声明，谴责山玉成，并宣称柬埔寨效忠于法国保护当局。

---

① 勒克莱克将军（General Leclerc），为当时法国远东军的总司令。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法国军队于同年9月23日在英国军舰的掩护下在西贡登陆。10月5日，勒克莱克将军在金边投下了空降部队，这样就开始了法国侵略柬埔寨人民的第二阶段。——译者

法国人没有恢复旧有的一套保护制度。1946年1月7日，法国和柬埔寨签订了一项临时协定，协定规定柬埔寨是“法兰西联邦内的一个自治国”。① 根据这个协定，柬埔寨有权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凡由于关系重大，需要国王陛下签署的立法文件、管理条例、声明、通告、一般指令及决定等项，均须征得高级专员的同意”。虽然临时协定声称废除旧保护制度，但绝大部分权限却转至虚构的印度支那联邦：大多数业务部门（其中包括大规模公共工程、大部分司法问题、财政、中等及高等教育、关税、矿山、铁路及外国移民等），均视作联邦事务，柬埔寨无权处置，而由法国高级专员直接管辖。法国军事代表团负责培训柬埔寨军队，但法国仍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外交事务由法国政府控制。这实际上仍是老一套的统治制度，只不过移交了某些微不足道的权力给柬埔寨人。法国人为了装点门面，就答应收回1941年日本人割让给泰国的

① 所谓“法兰西联邦”，是指法国本土、殖民地、附属地及托管地之集合体而言。设有“法兰西联邦议会”和“法兰西联邦最高委员会”。——译者

西部省份，至1946年底，这项收回工作遂告完成。

西哈努克国王和他的近臣认为，只有与法国人进行耐心的谈判，独立才能获得新的进展。这一主张得到法国人的赞许，他们声称愿意随时准备谈判。考虑到当时柬埔寨极度弱小的情形，西哈努克国王的态度就不算不明智。况且越南就是一例，它曾呼吁杜鲁门总统、斯大林元帅、艾德礼首相、蒋介石将军和联合国，反对法国重新占领西贡，但没有成功。胡志明政府比山玉成政府强大得多，但在1946年3月，①还是只好让法国军队进驻海防、河内。对柬埔寨来说，武装抵抗法国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柬埔寨人都同意这种看法。山玉成被捕之后，一些爱国者逃往泰国和那时仍被泰国占领的柬埔寨西部省份，在那里建立武装队伍，自称为高棉伊沙拉克或自由高棉

① 此处时间有错误。法越双方签订关于规定法军驻留地点限于河内、海防等十多处的《参谋协定》，是在1946年4月3日，而不是3月。——译者

人。① 泰国政府可能希望利用这些叛乱分子作为阻止法国重新统治柬埔寨的工具，以便能够继续占领那些割让给它的领土。在伯克钟的领导之下，成立了一个流亡临时政府，叫做高棉伊沙拉克委员会。当时在泰柬边境上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但自由高棉运动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构成严重的局面。伯克钟本人于1946年4月向柬埔寨政府投诚，同年稍后时期，泰国归还割让去的领土，因而使高棉伊沙拉克的斗争受到挫败。随着武力解放变得愈加不可能，以及柬埔寨的独立斗争转到议会舞台，许多伊沙拉克成员趁1947年4月颁布大赦的机会，纷纷回国参加民主党，使民主党壮大起来。到1947年年底，已有三千余名高棉伊沙拉克成员投诚。可能尚有同等数量的武装人员分散成东一小股，西一小股，其中有一些简直就与

---

① 高棉伊沙拉克（Khmer Issarak），即高棉民族统一战线，是柬埔寨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政治组织，成立于1946年。1950年初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高棉中央人民解放委员会和自由民族统一战线执行委员会，公推山玉明（Son Ngoc Minh）为主席。高棉伊沙拉克联合越南、老挝抗法组织，积极开展抗法武装斗争。日内瓦协议签订后，高棉伊沙拉克战士就地复员，有的参加了人民派。——译者

土匪无异。

高棉伊沙拉克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支反对法国人的武装力量。当这些小股武装主要在柬埔寨西部地区活动频繁的同时，另外一些小股武装在柬埔寨的东部地区也很活跃。他们是从越南南部流窜到柬埔寨来的，起初以这一带越南人聚居的地方作为他们的根据地。这些人就是越盟，① 或者叫做越南自由战士，最终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在越盟同在柬埔寨的法国人进行时断时续的战斗的初期阶段，一些越盟和高棉伊沙拉克，就不怎么分彼此的目标，建立了联系。② 不过，在这段时期，不管是伊沙拉克，还是越盟的力量，在柬

① 越盟，是“越南独立同盟”的简称。由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之前身）联合越南其他党派与社会团体于1941年5月19日正式成立。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为越盟主席。越盟自成立之日起，即着手组织游击队，开展反对日法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译者

② 1951年3月11日，高棉民族统一战线同越南国民联合战线和寮国自由民主统一战线举行了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宣言和决议，并组成有三国民族统一战线代表参加的越南——高棉——寮国人民联盟委员会。基于这次代表会议所发表的决议，越南志愿人员后来进入柬埔寨和老挝同高棉伊沙拉克部队并肩作战。作者说“他们是从越南南部流窜到柬埔寨来的”，这纯属污蔑。——译者

埔寨都不是很雄厚的；他们之间的合作尽管存在，在政治上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随后由于越盟的共产党特征明朗化起来，越盟与伊沙拉克之间的分歧，就日趋尖锐，以至到了最后，他们竟成了公开对抗的敌人，尽管法国人一直把他们说成是朋友和同盟者。

1946年的临时协定原只打算作为权宜之计，但法国政府与柬埔寨政府之间的谈判拖了将近四年，柬埔寨争取自由的运动这才到达第二阶段。甚至就连达到这一阶段，也主要是因为法国在越南受到较大的压力，使得法国于1949年3月同意给保大以较大程度的独立。① 1949年11月8日的法柬条约，其用意是给柬埔寨“独立”，但并不给予享有完全的主权：即承认柬埔寨在国际上享有独立国的地位，并同其他印度支那“联邦成员国”一样，许可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但是外交官员的委任，必须征得法国的同意。法国人还

① 1949年3月8日，法国总统阿里奥尔和保大在巴黎签订“法越协定”，规定越南为法兰西联邦成员国。同年6月14日，保大回到法国占领区西贡，就任傀儡皇帝，并着手组织伪政府。——译者

在条约中提出所谓的法兰西联邦，设有联邦议会和联邦最高委员会。其实这些机构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法国对联邦成员国的支配权。在军事方面，在和平时期，柬埔寨必须为法国提供军事基地，在战时，军事行动必须由法国控制。在司法方面，法国人（甚至中国人），依旧由会审法庭来审理。同时新条约还写进了保障法国投资的条例。不过，几乎在所有国内事务方面，柬埔寨得到了真正的独立。

西哈努克国王和他的首相严森保，枉费心机地把这一条约描绘成柬埔寨方面的胜利和能够得到的最佳成果——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确是再好没有的收获。西哈努克国王再次向伊沙拉克颁布大赦，法国则再次对伊沙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在这段时期内，时局颇有暂时稳定下来的样子。但是，有三种因素使时局无法稳定下来。第一，严森保政府是少数党执政的政府，反对党民主党①则是柬埔寨的多数党。民主党已成为柬埔寨民族

① 柬埔寨民主党成立于1946年4月，成员多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公教人员和学生。今天，在柬埔寨反动伪政权中，有不少是前民主党右翼分子，山玉成就是其中之一。——译者

主义的中心，自然要攻击法柬条约；柬埔寨国民议会也拒绝批准这个条约。第二，法国在越南遭受了新的失败，不愿意向柬埔寨新军提供军事装备，担心它们会落到伊沙拉克手中。同时，泰国政府不仅向伊沙拉克，而且也可能向越盟供应了武器。这样时局又日趋动荡不安。第三，由于柬埔寨国民议会一直拒绝批准法柬条约（事实上，条约签字时，国民议会刚刚给解散掉），西哈努克国王就一直谋求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实施草案”，来使条约生效。在谈判这些“条约实施草案”的过程中，法方认为，对他们在法柬条约中所作的某些让步，尤其是有关司法方面的让步，大可以乘此机会打些折扣。这样一来，就使得随后好几届政府拒绝在这些“条约实施草案”上签字。于是，除了人民对条约普遍不满的情绪和国内长期不稳定的时局之外，又加上了司法问题上的含糊不清。

在这一整段时期内，法国一直企图借柬埔寨国王之手，去反对柬埔寨政府和议会。法国玩弄的策略是，一方面使柬埔寨政府同在野党对立，另一方面把民主党描绘成君主政体的敌人，把伊

沙拉克描绘成共产党的帮凶。况且，他们当然有权力撤换国王，也能够获得一些深知朝廷里勾心斗角的内幕的顾问专员们的支持。当严森保政府拒绝签署一项确认法国军事控制的“临时军事协定”时，法国就说服西哈努克国王解散政府。

毫无疑问，在西哈努克国王看来，柬埔寨之所以迫不得已依仗法国势力，不仅是为了维护君主政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使它免受越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严森保则相反，当1950年他向一位来访记者发表声明时，不但说出了他自己的意见，而且也说出了他的政敌民主党的意见：“没有法国的帮助，我们也能对付伊沙拉克。如果这个国家真正独立的话，就不会有伊沙拉克。因为那时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警告说，法国所采取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措施，将会把伊沙拉克推到越盟的怀抱。

但是，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讲，而西哈努克国王正是这样做的。既然他可以警告法国，说他们的军队留在柬埔寨助长了伊沙拉克的气焰，他也可以同样警告伊沙拉克，说他们的活动为法国在柬埔寨驻军提供了依据，他们分裂了国

家，他们的活动帮了越南共产党（越盟）的忙，他们危害了唯一能使柬埔寨团结在一起的基础——君主政体。这样的说服工作，和相当实惠的奖酬措施结合在一起，成功地使一个当时最重要的活跃的自由战士走出丛林，投诚归来：这个人就是琼·莫舒皮，他今天仍以他的化名“德普”琼而为人所知。但是，这位勇敢而又神秘的领导者，坚持要求把他的部队编入柬埔寨军队，同时保留他对他的部队的完全控制权。直到现在，他还统治着暹粒省，就好象是他的私人封地一样。对西哈努克国王来说，“德普”琼的投诚是一项重大成就；它被用作（尽管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结果）一个论据，借以向法国人证明，处理伊沙拉克问题，柬埔寨军队比他们更有办法。

1951年，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新的选举举行了，结果是民主党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新政府的要求之下，西哈努克国王征得法国的同意，将山玉成从法国遣返回国。山玉成到达金边时，使得这个首都爆发出空前绝后的民族主义的狂热；自波成东机场至首都，沿途一万多人夹道欢迎。山玉成已成为争取完全独立和主权而战

斗的象征，他在知识界、佛教界和军队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至于在民主党内的影响，那就更不消说了。

山玉成认为，只有一种政策可以奉行，那就是要求，坚持，并在必要时进行战斗，以从法国人手中获得完全主权的独立。这一点他从未让人有过任何怀疑。他回国之后不久，在一位能干的助手艾·西邵的帮助下，开始出版一种叫《吉蔑·克罗克》（意为《柬埔寨之觉醒》）的报纸。这种报纸的出版使得反对法国的怒火有如火上浇油，熊熊燃烧起来。法国人很快就明白过来，他们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让山玉成回国。当他们企图在他脸上抹黑，把他说成是共产党的做法宣告失败之后，他们就决定逮捕他，并再一次将他遣送出国。但是，有人及时通风报信给山玉成，他就和艾·西邵一起潜逃，跑到丛林里参加伊沙拉克去了。

作为伊沙拉克的一个成员，山玉成既不同于往日担任首相的山玉成，也不同于曾经和西哈努克国王忠实合作共事的凯旋归来的英雄。当他看到自己又一次受到西哈努克国王的谴责并被斥为

叛徒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作了回敬，说西哈努克国王本人是法国的傀儡，并且鼓吹柬埔寨作为一个共和国可能会过得更好些。山玉成组织了一个“民族解放委员会”，很快他就给伊沙拉克运动带来了新生。尽管伊沙拉克运动在其全盛时期也不过一万多人，这时却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这个新建立的委员会曾否与越盟发生过正式关系，是有争议的。据悉，有几次，山玉成的部下曾经同越南共产党以及受越南共产党鼓动的柬埔寨籍的越盟成员发生过战斗。

为了把水搞混，越盟方面也成立了一个“柬埔寨人民解放委员会”，并捧出一位他们称呼为山玉明① 的人当领袖。这个人以前谁也没有见过；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利用山玉成的威信。而且，为了进一步制造混乱，山玉明搞了一个叫做“伊沙拉克统一战线”的名堂。跟往常一样，共产党人总是不遗余力地利用每一民族主义运动，加以渗透，并窃据它的领导权。可悲的是，法国人在柬埔寨的所作所为与德国人占领法

① 山玉明(Son Ngoc Minh)原是金边的佛教法师。后来参加反法斗争。曾任高棉中央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译者

国时的行径如出一辙：他们把一切抵抗战士都称作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的帮凶，这样不仅没有削弱抵抗运动的威信，反而抬高了共产党的声望。

于是，柬埔寨的局势就变得十分危急了。社会上惶惶不安的情绪与日俱增，人们对应当同伊沙拉克作战的柬埔寨新军是否暗中援助了伊沙拉克，也产生严重的疑问。青年人、许多佛教僧侣和多数党，都把西哈努克国王当作傀儡看待，同情抵抗运动。1952年6月，西哈努克国王不得不解散民主党政府，因为民主党政府变得一点也不听话了。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授予他三年紧急权力，并保证在这期间内为柬埔寨取得完全独立。

这个声明很坦率地指出了西哈努克国王和伊沙拉克之间的分歧："伊沙拉克声称是为了柬埔寨而在作战，"西哈努克国王说，"军队和警察又何尝不是如此。如山玉成曾经说过的，所有的柬埔寨人都必须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问题是站在哪一条战线上。"西哈努克国王补充说，他知道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傀儡，只迷恋于寻欢作乐和追求自己的权势。继而他又抱怨说，"有一些人对我怒目而视，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把他当作

一个无用而有害的累赘……但是，他的良心是清白的。“另一方面，”他最后说，“那些所谓的英雄们，却一点建设性的事情也没有做；当他们吵吵嚷嚷，说法国没有给予真正的独立的时候，他们却带来了混乱、分裂和破坏。他们指控公务人员榨取人民的血汗，但他们自己却随意占用国家的财富，既不要舆论同意，也不受任何约束。如果伊沙拉克得势，那就会出现无法无天的专横与霸道。……”以上是西哈努克国王在1952年6月17日的声明中讲的一番话。

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一下，现在就可以看清楚，西哈努克国王当时不仅受到伊沙拉克，而且还受到法国人的严重误解。当西哈努克国王解散民主党政府的时候，不单单是因为他和民主党意见不合，而且也因为他受到法国极其强大的压力——法国的坦克就在金边巡逻，同时法国联邦部部长让·勒杜尔诺又曾特别声明过，法国决不对一个民主党政府作任何让步。解散民主党政府之后，西哈努克国王打算亲自出马去取得法国的让步，而且把自己全部前程都押在这一赌注上。到了1952年年底，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

他能向法国人证明他控制得住他的国家时，他才能谈判成功。

但是，形势的发展则是相反。1953年1月，一枚炸弹在法国人在金边办的一所西索瓦高级中学的教室里爆炸了，一位省长在越盟的伏击中被杀，一位县长又在距离金边只有二十英里的地方被杀。在要求国民议会通过一项预算案，批准1949年的条约，并授予他紧急权力的努力失败之后，西哈努克国王就于1953年1月13日解散了国民议会。他宣布戒严令，下令逮捕了十二名民主党议员，同时还突然把柬埔寨驻曼谷大使馆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停了职，因为这个大使馆显然曾经把从金边弄到的金钱和军事情报藏在外交邮袋里运到泰国，然后直接交给在泰柬边境上的伊沙拉克。这样一来，在金边及各省省会，不管是对西哈努克国王，还是对法国人，都不再有公开的反对活动了。但是，超过五分之三的柬埔寨国土，都落入伊沙拉克和越盟的手中。

解散国民议会之后，西哈努克国王随即离开柬埔寨，到"意大利作一个月的休假"去了。观察家们没有忘记，西哈努克国王曾经是一个浪荡

公子，政治上时热时冷，有时劲头很足，有时漠不关心，有时甚至把政治视同儿戏。因此，对他这次欧洲之行，他们把它说成是他的冷热无常和缺乏毅力的又一次明证。当他在法国的里维埃腊的海滨浴场那波勒住下来的时候，他的政敌们无不兴高彩烈，以为他很快就会以自己的行动证实他们对他所散布的流言蜚语。

其实，西哈努克国王只不过在加紧准备他的大反攻。因此，过了不久，载兰格拉地将军①就说西哈努克国王“发狂了”，而法国《竞赛》杂志也称他为“柬埔寨的疯君”。（在随后一个时期内，怒气冲冲的法国报纸，登载了许多有关他的私生活、吹奏萨克管、恋爱艳史和银幕生活之类的消息，使得一些外国记者直至今日，尤其在他们编辑出版“背景资料”时，还对他的性格品行，作了不正确的评介。）然而，西哈努克国王是非常一本正经的，如果用佛家的术语来说，他开始进入完全新的化身境界。1953年的西哈努克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敢下大赌注，又很精明。

① 载兰格拉地将军（General de Langlade）为1953年法国驻柬埔寨的高级专员。——译者

由于得到善于谋划的宾努首相和机灵敏锐的桑·萨里顾问①的辅佐，西哈努克国王现在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自从他从事于如他所宣称的“争取独立的改革运动”以来，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他从未在任何一次政治斗争中吃过败仗。

西哈努克国王首先向法国总统送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用他通常颇为繁赘的文体，彬彬有礼地陈述了为什么应当马上给予柬埔寨以完全独立的理由。他指出，“伊沙拉克宣传说，我是获得完全独立的主要障碍……他们说我和我的政府太亲向法国，无法使我们国家

埔寨就不是真正独立的时候，我又能回答些什么呢？”他宣称百分之八十的佛教僧侣，大部分的知名人士，政府官员和学生，都受到了伊沙拉克的影响。“我认为，而且我要说，倘若法国不打算违背它的使命以及它对柬埔寨作出的诺言，那么法国就必须彻底改变它的政策……在我看来，让柬埔寨人民决定他们国家的命运，这不仅是法国的义务，也是符合法国的切身利益的。”西哈努克国王引用了许许多多的论据、申诉、先例和类似情况，末了还表示要亲赴巴黎商谈他的要求。

这时，西哈努克国王拒绝接受一切空头诺言，决意不获得完全的独立，就不罢手。带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把山玉成和伊沙拉克的危险，作为他的最有力的论据，而同时又继续不断地强烈谴责山玉成，把他同共产党混为一谈。（他甚至还可以写信给法国总统说，“法国政策的危险，在于它可能把柬埔寨人推向山玉成的怀抱，即共产党的怀抱。”）因此，山玉成完全可以说，西哈努克之所以要求完全独立，是由他所推动的。另一方面，可悲的是，甚至在西哈努克国王发起争取完全独立的运动之后，山玉成

还是不肯支持他，直至现在仍不跟他和解，老是怀疑他向外国人卑躬屈膝，把祖国出卖给外国人。后来山玉成竟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外国豢养的诽谤者，一个牢骚满腹的政客，在泰国边境的森林中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万念俱灰。最后他情愿流亡异邦，饱尝艰辛，也不肯回到柬埔寨——因为在柬埔寨，日日夜夜他都将听见人们颂扬他的政敌西哈努克为祖国赢得了独立。

这时法国政府正忙于操心越南北部日益吃紧的局势，无暇顾及西哈努克国王的迫切要求。当时西哈努克国王住在里维埃腊，很容易使人把他同越南的风流皇帝保大的行径相提并论。法国总统仅仅把西哈努克国王的呼吁提交政府考虑。尽管法国总统阿里奥尔邀请西哈努克国王共进午餐，但随后发表的公报只强调法国无意将全部军事权力移交给柬埔寨。联邦部部长发表谈话说，西哈努克国王呆在巴黎，是在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并暗示他应该回到柬埔寨去。西哈努克国王认为这是对他明目张胆的侮辱。他没有返回金边，却去渥太华和纽约。在纽约，他接见了一次新闻记者。他说，如果越盟的正规部队侵入柬埔

寨（那时他们正侵入老挝），他们不会遇到什么抵抗，因为法国强加给柬埔寨自治的种种限制，不仅使柬埔寨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而且使人民认为，越盟只不过是为了民族的独立才作战的。接着西哈努克国王又乘飞机到达东京。回到金边时，他在王宫阳台上向欢呼的群众正式宣布他的“争取独立的改革运动”。他随即离开金边，故意跑到曼谷去流亡，用这种戏剧性的行动使人民重视他所从事的斗争。不久，他回到柬埔寨西部的马德望，但是他立下誓言，除非取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否则他决不回金边。

他跑到曼谷这一惊人之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金边，形势对法国人造成很大的威胁，他们只好增加驻军，以保护法侨，同时还把武器分发给金边的法国公民。很明显，要应付当时的形势，就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法国于是在7月3日提出给予“联邦国家①完全的独立和主权”。但是法国仍然打算通过谈判来讨论实施的办法。西哈努克的回答是，要求全部地无条件地立即移

① “联邦国家”系指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成员国。——译者

交军事、政治、金融、经济、关税和司法方面的主权，只同意让法国保留一些驻防军队和享受经济方面的优惠待遇。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法国终于作了让步。最后一个相持不下的问题，是有关尚在法国指挥下在国外作战的柬埔寨部队，但法国最后同意这些部队也编进柬埔寨军队，让柬埔寨国王接管在法国军事控制下的一切地区的军事统率权。尽管收回军事主权只在一个局部性的协定中得到体现，但柬埔寨人认为这是国家主权获得最后承认的标志。西哈努克国王宣布，国家已经获得了独立，并于1953年10月8日，以祖国解放者的身份，胜利重返金边。

柬埔寨的完全独立虽然得到承认，但法国与越盟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这样一来，越盟是越南人的这一特性就变得更加明显起来。虽然宾努首相曾声明过，“除非共产党试图用武力把他们的信仰强加给我们，否则柬埔寨没有必要去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战争正要结束的时候，越盟侵入了柬埔寨。他们不是游击队，而是来自北越的正规部队。他们闯入柬埔寨东北部的结果，恰恰做了法国与柬埔寨

国王都未能做成功的事情：那就是使每一个柬埔寨人都看得很清楚，越盟事实上就是越南侵略者，他们的斗争与柬埔寨的独立没有丝毫关系。

在日内瓦，共产党国家仍然企图要把山玉明的“解放委员会”当作一个抗战政府来看待，要求这个“政府”在会议中享有与越盟同等的代表权。山玉成也提出要求参加这个会议。但是他们的要求大会一概不予接受。大会的最后协议清楚地规定越盟从柬埔寨撤出军队；在停战协议生效时，越盟的大部分军队实际上撤离了柬埔寨。① 至于柬埔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后来是怎样改变的，将在另一章叙述。

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山玉成利用对一切叛乱分子实行大赦的机会，曾在短时期内从丛林中出来，企图重新踏进政界。1954年11月，他写了一封信给西哈努克国王，保证效忠于国王，并要求国王召见他。这一消息在金边根本没有发表，人

---

① 高棉中央人民解放委员会（即高棉伊沙拉克）根据日内瓦协议，于1954年7月24日发布停火令，抗战部队战士在停火一月后完成了就地复员的工作。同年10月18日，越南志愿人员已完全撤回越南。——译者

们只是从印度和泰国的电台中得悉。如果山玉成干脆回到金边，——在那里他将会得到刚刚到达的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保护，——他或许有可能逐步东山再起。但他却要求国王召见他。西哈努克想起山玉成三年前回到金边时受到盛大的欢迎以及他的不受欢迎的政见，不仅驳回他的请求，而且还对他进行公开的谴责，答复他说："当国王陛下正处于完成他的崇高使命的关键时刻，你不愿为他效劳，反而跑到丛林中去干反对他的勾当，试图阻挠他完成他的使命。你违背了诺言，你公开攻击国王陛下和他的政府，说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做，只不过演了一出麻醉人民的喜剧，好让法国得以压迫柬埔寨人……如果国王没有为柬埔寨赢得独立，人民就会把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处死，因为你和你的追随者曾经谴责他们是卖国贼。"当然，这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

六

柬埔寨民主政治的苦难

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柬埔寨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这种民主政治尚未经过很长时期的试验，况且又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国家的局势极不稳定，争取独立的斗争成了一个国内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如何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议会与西哈努克国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此外，西哈努克国王与多数党，对应该如何管理国家，看法也是有分歧的。结果，柬埔寨出现了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特殊政体。这并不奇怪，因为西哈努克国王（现在是亲王）的个性也是与众不同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柬埔寨的全部历史都是以他为中心的。

尤德旺亲王是柬埔寨的民主之父，他于1947

年去世，终年三十四岁。①他还是民主党的创始人，同时，他被公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善于辞令，精力饱满。尤德旺亲王曾在法国受过教育，对公民自由权和议会民主怀有坚强的信念，而他对这两者的看法，又和当时法国左翼人士一致。但是，被指定帮助他起草柬埔寨新宪法的法国官员，正如印度支那所有的法国官员一样，都是右翼人士。而在法国国内右翼人士则已经拒绝接受法国的新宪法，因为他们认为法国新宪法给予国民议会过多的权力。在金边的法国人于是首先建议，柬埔寨应该仿效波斯的而不是法国的宪法。后来，他们试图限制新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自由权。最后，他们就以法国宪法中没有规定的"解散议会权"为借口，企图使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停滞不前。

但是，尤德旺亲王坚持要得到法国自己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全部自由，结果使得最早的柬埔

① 尤德旺亲王(Prince Yutevong)是西索瓦国王的曾孙，为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据悉，当时法国驻柬埔寨高级专员在给法国政府的秘密报告中曾提出要注意这位亲王所进行的活动。这个报告发出之后不久，这位亲王就给法国人暗害了。——译者

寨宪法[1]几乎包括了法国宪法所有的弱点——仅有一处是例外：它允许政府要求国王解散国民议会。尽管这样一条规定对法国可能是非常有益的，然而，不幸得很，在柬埔寨它却导致了政局的不稳定，因为不仅在政府和议会[2]之间，而且也在政府、议会和国王之间，产生了分歧。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制订宪法的人再也没有料想到的。

普选制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有一种固

---

① 柬埔寨宪法于1947年5月5日颁布，规定柬埔寨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宪，三权分立。国王是国家的最高元首，有颁布法律、解散国民议会、挑选内阁首相、任命部长、授予行政与军事衔级、任命司法与外交使节的权力，同时又是王国军队之最高统帅。——译者

② 柬埔寨议会分为两院，即国民议会和王国会议。

国民议会由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有立法权、内阁人选同意权和倒阁权。国王在国民议会成立十八个月后，有权解散国民议会。1958年1月8日国王下令解散第三届国民议会和修改选举法，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每三万名居民选出一名议员。

王国会议的权限主要是审查国民议会初读通过的法案及政府向它提出的一切问题，并提供意见。国民议会通过的法案，如被王国会议否决或修改，只要国民议会仍以绝对多数维持原议，即可成立。王国会议议员共二十四名，其中二名由国王在王族中指定，二名由国民议会选举，八名由省、市选举，八名由各行业选举，另四名由公务人员选举。——译者

有的推动力，使得新选出来的人民的代表试图以人民的名义来行使最大的权力。柬埔寨这方面的记录与其他许多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首届国民议会原定为一个“諮询机构”，但它一经普选产生，就开始无视法国和柬埔寨国王关于它只能考虑宪法草案事宜的意见。甚至在宪法草案生效以前，1946年的諮询议会就讨论了诸如对暴动分子实行大赦的问题，尽管在技术上来说它是无权这样做的。一怒之下，亲法首相莫尼雷特亲王代表他的内阁提出辞职。后来民主党的领导人尤德旺亲王，成为第一个对柬埔寨议会负责的首相。但是，他也是第一个使得议会反对国王的首相，虽然他也许并不是有意识地要这样做。

在 1947 年 12 月的选举中，议会七十五个议席中民主党获得了五十四个席位，与皇族颇为亲近的自由党只得剩下的二十一个席位。其他一些涌现出来的政党，不管是涅刁龙领导的高棉革新党，还是钦迪领导的国民党，均完全失败了，没有获得任何议席，尽管这些党的领导人其后也有了一些声名。如果说各政党之间具有壁垒分明的政见，未尝不是言过其实；同样，以为当人民选举民

主党出来执政的时候，他们作出了清醒的选择，那也是一种夸大的说法。总而言之，关于民主党这个党，所能说的只是：它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知识分子（即高中毕业生，他们大多数为政府小职员）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它被认为是能为国家取得完全独立的最有希望的政党。当然，民主党对于国王是完全忠诚的，也颇得佛教界的好感；如前所述，尽管佛教僧侣并不公开参与政治活动，但他们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民族主义力量。

我们不能说第一届议会工作得井然有序，效能又高。由于缺乏实行议会制和政党制度的经验，不仅使得议会工作停滞不前，而且也使得民主党内部经常发生分歧。以鲜万为首的首届内阁，①觉得权力不足，要求增加权力，但就在这个问题上，马上给撵下台了。其后一届内阁，以宾努为首相，因为一个和批准河流捕鱼权有关的贪污案子，也很快被推翻了。河流捕鱼权这个问题在柬埔寨经常关系着成千上万的人民的生计，因为在湄公河或洞里萨湖的支流上修建拦河捕鱼堤的特

① 柬埔寨内阁由首相、各部大臣和国务秘书组成。首相由国王指定，各部大臣由首相提名经国民议会通过。——译者

权，会剥夺下游所有渔民的谋生之道。(拦河结网捕鱼在君主专制时期也是应处死刑的犯罪行为。)一个名叫严森保的议员抓住这样一个公众关心的问题，推翻了政府。他退出民主党，另外组织了一个少数党。严森保是一个很有手腕的政治策士，他认为得到了公众舆论的支持和西哈努克国王的信任。果然西哈努克国王任命他接任宾努，当了首相。

国王与议会之间的鸿沟就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大。议会七十五个议席中，严森保只有十二个席位。西哈努克国王任命严森保接任首相，很可能选中了最为干练的人，但是他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才使国民议会同意严森保当首相。后来，民主党一直懊悔自已向国王作了这样的让步。严森保是一个很有活动能量的首相。他从法国那里取得了某些让步，又揭发了贪污行为，但是他一直和国民议会意见不合。多数党妒嫉严森保在与法国的谈判中获得成功，开始对他们的谈判设置种种障碍。一些人害怕严森保首相会成为一个独裁者，就连与西哈努克国王很亲近的人士也对他产生怀疑，因为他和西哈努克国王的母亲哥沙曼公主的

关系很密切，而哥沙曼公主对她的儿子——过去是，现在也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民主党终于抓住了一个法律程序上的细节问题，通过了一项对严森保的弹劾动议。严森保首相威胁议会说，他要请求西哈努克国王解散国民议会，除非议会撤消这个弹劾动议。但是，国民议会不肯让步。于是严森保请西哈努克国王签署了一道解散议会的法令。国民议会随即于1949年11月17日仓促收回弹劾动议，但是已经太迟了。民主党极端派议员的这些行动威胁到法柬条约的最后谈判，使得西哈努克国王受到很大的惊动与不安，因此他最后作出决定，鉴于国民议会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态度，于11月18日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这次解散国民议会是完全合法的。有问题的是任命严森保继续留任首相，因为宪法规定，倘遇议会解散，国民议会的议长代行首相职务，至新议会选举完毕之时为止。但国民议会议长尤·库斯不久之后遇刺，刺客也同时给干掉了。这一事件不仅使民主党更加担惊受怕，而且也使得反对政府的地下活动有增无减。

随后，在整个柬埔寨，叛乱事件相继不断，弄得人心惶惶。严森保于是又利用了这一形势，作为延期举行选举的合法依据。甚至有理由相信，严森保和某些叛乱组织有联系，并且唆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进行活动，以增强他推迟选举的依据。民主党公然抨击任命严森保留任首相和推迟选举，说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但是大多数人对西哈努克国王坚持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作出延期举行选举的决定是欢迎的，因为他们对许多议员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感到失望和沮丧。

在解散国民议会时，西哈努克国王就曾公开宣布，他并不打算背离法律和民主原则。但是他现在感到处境很困难，因为这时国民议会已经解散，无法由它来批准1949年的法柬条约，同时他又知道，如果他恢复本届国民议会，它一定会否决这个条约。他开始考虑能否对宪法进行一番修改，使国民议会只成为一个諮询机构，把批准权转到国王自己手中。但是，按照宪法规定，修改宪法必须得到国民议会中四分之三的票数的同意。既然国民议会已经解散了，西哈努克国王就只好与各政党的领导人打交道。民主党和自由党

都竭力反对对宪法作出任何足以削弱国民议会的权力的修改。这样一来，修改宪法的计划，就只好放弃了。不过，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西哈努克国王后来还有几次企图绕过议会，修改宪法，但每次均因不愿非法从事而退缩作罢。尽管从宪法的观点来看，有几届政府是有问题的，但西哈努克国王总是小心谨慎地设法使自己处于合法的地位。

由于一方面受到法国人的反对，另一方面不断有人指控政府贪污，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甚至金边也不安宁，经常发生学生罢课和开枪事件，因此 1950 年 5 月，严森保的政府变得更为孱弱了。正如我们在前章提到过的，西哈努克国王最后就牺牲了严森保。有一个短时期，他自己领导了一个政府。最后出现了一个由他的叔父芒尼冯亲王所领导的临时政府，由民主党、自由党以及当时出现的其他各式各样的政党的代表所组成。这个临时政府自称在全国各阶层中有着广泛的代表性。但是这个政府的影响就象一个膨涨的氢气球一样，终于在举行下届选举的时候被戳破了。在最后决定再次举行选举之前，各政治党派之间的

争吵和倾轧、互相竞争、互相攻击、贪污腐败、意见分歧、结伙抢劫、阴谋鬼计、法国的压力以及芒尼冯亲王的政府倒台之后的三个月的政治危机等等，是这个时期的标志。

正如前面我们所见到的1947年的选举一样，在1951年11月举行的选举中，民主党再次取得象上次那样的胜利，在议会七十八个议席中，它获得了五十四个席位。自由党以十八席仍居第二；暹粒省的（我们已经知道，暹粒省已成为德普·琼的私人封地）德普·琼党有四个候选人当选为议员；“东北高棉战胜党”和高棉革新党共获得二席。其他集团，包括严森保的国民建设党在内，未得一席。甘德当了首相。但由于民主党坚决反对法国当局，柬法关系立即出现严重的僵局。山玉成的逃跑以及随后日趋动荡的时局，都与民主党中的某些上层人物有关连。

西哈努克国王现在坚持要对伊沙拉克采取强硬措施。但是内阁以维持秩序的名义而采取的全部措施，只是逮捕它自己的政敌，其中包括西哈努克国王的朋友严森保在内。这样就做得太过分了，使西哈努克国王无法容忍。于是在1952年6

月15日，他解散了政府，并亲自接管首相职务。但是，对解散国民议会，他却犹豫不决，反而要求国民议会批准他这种超越宪法的行动。国民议会不敢公开反对西哈努克国王，他们回复他说，既然他认为他的行动是基于一切权力都是君王所赐的原则，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议会方面决不能将人民委托给议会的权力任意授予他。

不管是回顾柬埔寨的过去，还是看看它的今天——今天的形势在某些方面已经大为不同了，——引述几段西哈努克国王给当时正要下台的甘德政府的信件，是饶有兴趣的。他写道，甘德政府没有执行他提出的路线，而是执行“民主党指导委员会所制订的方针……大臣们把党派的事情与国家的事情混淆起来，好象他们一党的利益事实上就是国家的利益……其他的人无权对你们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如果他们那样做，你们就向人民说，他们要违背民主和推翻宪法……国王同其他的人一样没有保证，因为你们不让他有任何实权处理国家的事务，理由是这种权力是人民通过选举授给你们的。至于人民，你们给他们的印象是，他们在管理国家大事。但另一方面，你们

对人民隐瞒你们正在把国家引向死亡，引向压迫，引向暴徒的抢劫和暗杀这一事实真相，而仅仅用关于独立的空谈使他们头脑发热。……当我为国家制定宪法的时候，我怀着这样坚强的信念，即我是把我的权力交给那些对民主抱有真正信仰的人。……”当然，民主党并不否认他们没有执行西哈努克国王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贯认为，在一个君主立宪国家里，国王只能统而不治——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参与政治。

西哈努克国王于1953年1月解散第二届国民议会的时候，柬埔寨的民主政治就完全搁浅了。在“争取独立的改革运动”这一时期内，柬埔寨政府主要由宾努主持，涅刁龙、钦迪、严森保和前民主党人松山、沈法等人也在政府的领导岗位上工作。西哈努克国王在他接受政府全部权力时曾经宣布说，他将负责向人民说明他在三年内的执政情况，并曾在“诸神灵和纯真的女神”面前宣誓，“在任期届满的时候，我允许人民公开向我提出责问和对我作鉴定。”在1955年2月的公民投票中，他兑现了这一诺言。当时提交人民讨论的问题是：人民是否认为西哈努克国王赢得了

国家的独立。这次公民投票运动的口号是："如果你热爱国王，请投白票；如果你不热爱国王，请投黑票。"这次投票不是秘密的。投票的结果是，白票九十二万五千六百六十七张，黑票一千八百三十四张。

根据日内瓦协议，柬埔寨答应要"采取有效措施，俾使全体公民不受任何歧视地团结在全国共同生活中，并保证他们享有王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和自由。"①它同时还保证，"全体柬埔寨公民均能自由地以选举人和候选人的资格参加秘密投票的全国选举。"②西哈努克国王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准备选举事宜，并邀请所有政党，其中包括民主党，参加政府工作。民主党声明，它要首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参加的问题。但是，当民主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以兰·涅特为首的临时政府已经组成，它拒绝民主党的代表参加。尽管如此，民主党准备使用其久

① 见《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附件二：《柬埔寨王国政府声明》（《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第7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北京。）——译者

② 见注①。——译者

经考验的政治机器，以迎接即将来临的政治斗争。

不过，并不存在真正的政敌。近几年来，柬埔寨的全部政治生活是以西哈努克国王及其左右为一方，民主党为另一方而划分为两极的。如果西哈努克国王自己不参加竞选运动，民主党看来势必在选举中轻易获胜，因为只有民主党才为人民所熟悉，而且被认为是一贯拥护国家独立的政党，其它的政党不可能与之抗衡。但是，这个时候，一份份的请愿书开始递向王宫，建议选举延期举行，或者干脆取消。西哈努克国王看到这些请愿书，当然很高兴，而且我们不妨揣测，西哈努克国王又把他的这一喜悦心情转达给各省官员。接着游行示威发生了，对旧的政治体制表示不满，并要求西哈努克国王自己在管理国家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

西哈努克国王召集了两个心腹顾问，桑·萨里和严森保，共同研究用制宪方式来满足人民所表达的愿望。（严森保后来对这件工作产生了怀疑，没有表示赞成。）结果西哈努克国王自己提出了一个宪法修改案，并在1955年 2 月19日的一次会上亲自向各国外交使团、国际监督委员会的

印度、波兰和加拿大的首席代表，以及柬埔寨达官贵人宣布了这一宪法修改案。

新的宪法修改案考虑废除西哈努克国王认为应对国家的大部分灾难负责的政党制度。按照这个宪法修改案，内阁由国王指定，并直接对国王负责。民主还是有的，不过这种民主是“人民所能理解的那种民主”罢了。这种民主是以地方候选人得以直接选到省议会和金边的议会为基础的。但是，此后国民议会不得推翻政府，议员必须是各个选区的居民，而不是象以前那样，仅仅是那些居住在首都的政府官员。而且，政府官员和议员可以由他们选民加以罢免。为了确保新的国民议会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宪法修改案规定，所有的候选人必须是在他们各个选区居住过三年的居民（这一规定把一切伊沙拉克都排除在外）。西哈努克国王提议对这些宪法修改项目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然后再举行全国普选。关于举行全国普选一事他曾亲自向全国人民和日内瓦会议成员国作出保证。

在提出这一引人注目的宪法修改案之后两个星期，西哈努克国王突然逊位了。他宣布他这一决

定是不可能改变的，并指定他的父母，苏拉玛里特亲王和哥沙曼公主继承他。至于他自己，他说，此后他将象一个卑微而贫苦的人一样在人民中间生活。他曾经试图为人民进行过一些改革，这些改革将允许人民废除政党，罢免不诚实的官员和撤换那些人民不信任的议员。但是，这一改革运动遭到了“政客、富人、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向外国人诉苦、希望这些外国人根据他们对日内瓦协议的曲解而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不诚实的人们的反对。”

虽然西哈努克国王逊位的原因在当时一直是个难解的谜，然而现在来看，可以在他的逊位文告中找到全部的答案：他的宪法修改案甚至在被人认为是唯命是从的政府中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并且引起了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惊讶，因为对候选人的限制（要求在选区居住三年）似乎与日内瓦协议的第六条[1]相矛盾，根据这一条款，柬埔寨已答应让“全体公民不受任何歧视……享有王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和自由。”但是，如果他的宪法修改案没有在选举举行之前通过的话，民主党

① 应为《日内瓦最后宣言》第三条。——译者

势必再次取胜——除非找出别的办法对付他们。

西哈努克亲王（这是他逊位之后的称呼）找到了这种办法。根据3月9日的无线电台广播，他说，“虽然我已逊位，但不是为了抛弃人民，而是为了把他们从压迫着他们的民主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我所拟订的新的宪法修改案的胜利。”事情不久就变得很清楚：尽管西哈努克亲王逊了位，但他依然控制着政府，他的地位依然比他的父母重要。政府把原定在4月举行的选举推迟了。在4月初，掀起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即人民社会同盟运动。①这个运动旨在团结所有思想正确的柬埔寨人，推选出忠于苏拉玛里特国王和前国王西哈努克的代表，并以合法的方式投票

---

① 人民社会同盟（Sangkum Reastr Niyum）成立于1955年3月，盟员约五十万人。据该盟成立时发表宣言称，其基本原则是国家、宗教和国王三位一体。盟章要求全国团结，主张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机构改革，尊敬精神上的品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各方面的进步。人民社会同盟自1955年10月以来，一直是执政者。每六个月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57年1月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曾通过决议，确定柬埔寨是中立国。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总书记：宾努亲王。——译者

通过后者所制订的宪法修改案。换句话说，人民社会同盟是西哈努克亲王企图得到宪法所规定的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而作出的尝试，其目的在于按照他所提出的路线来修改宪法。这时，关于候选人需要有在选区居住三年的条件以及关于举行公民投票的打算被放弃了，宪法修改案的条文也作了某些修订。

人民社会同盟提倡“小人物”参政论，选民有权罢免失职的大臣、议员和政府官员，但另一方面又承认国王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首脑，允许他将大臣撤职以及把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议员送回给他们的选民。按照该同盟的纲领，国王应为“宪法的最高仲裁者”，只有他才有权对宪法提出任何新的修改意见。后来，在人民社会同盟执政的时候，宪法修改案中关于增加国王的权力的条款就放弃了，只有那些限制政府和国民议会的条款才规定下来。

人民社会同盟运动所向披靡，节节胜利。应予着重指出的是，人民社会同盟运动并不反对民主——恰恰相反，它鼓吹的是一种更好的民主。甚至今天，西哈努克亲王还振振有词地说，由于

他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柬埔寨比其他任何国家享有更多的真正的民主。1955年 9 月的选举，实际上成了西哈努克政治生涯中为实现他的施政纲领而举行的另一次公民投票，西哈努克亲王把所有的政敌都描绘成不忠于君主政体的人；他以祖国解放者的身份亲自出马参加这次政治运动，指控民主党与共产党互相勾结，并且许诺要把政客和飞扬拔扈的官员从这个国家中清除掉。当时政府机构全力支持人民社会同盟。反对党对西哈努克亲王的批评被政府说成是煽动暴乱，破坏治安；在金边，民主党的一次群众集会竟在警察鼻子底下受到暴力手段的驱散。不过，这次选举还是自由的。尽管有某些不合法之处，国际监督委员会认为选举还是符合日内瓦协议的规定。

在1955年 9 月11日的选举中，西哈努克亲王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百分之八十二的选票以及国民议会中的全部席位。民主党获得了约百分之十二的选票。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即人民派。人民派是以越盟抵抗运动为基础成立起来的，显然，它就等于柬埔寨的共产党组织。在这次选举中它只得到百分之三的选票。不过这些票数来自

一些以前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说明了越盟在这里还有不少勇敢的同情者，有朝一日他们会很轻易地再度制造麻烦。大选之后，民主党几乎不敢公开活动了，但没有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民主党自1955年年初的党代会以来，左倾分子就打进了党内，现在成了以左倾分子为一派和以山玉成的追随者及少数温和派的老党员为另一派的暗中交锋的战场。但是山玉成这一派在党内取得胜利之后，对改善民主党与西哈努克亲王的关系却毫无作为。事实上，民主党与西哈努克亲王之间的分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他们之间互相憎恨又互相害怕的程度远远胜过不管是民主党还是西哈努克亲王对于共产党的憎恨或害怕。正如在下一章我们将会弄明白的那样，这一点对柬埔寨的对外政策已经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自 1955 年 9 月以来，人民社会同盟就一直在朝执政，没有受到竞争。对西哈努克的领导，也没有人加以反对。不管西哈努克行使首相职权的时候（他曾几次出任首相），或是退居在暹粒的别墅，他都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即使他退居在暹粒，政府也把一切重要的甚至无关紧要的决

策呈送他过目。他操纵着人民社会同盟、议会和政府，同时还对他的父母苏拉玛里特国王和哥沙曼王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制订了新的社会经济措施，并且设立"全国代表大会"来充实他的宪法上的改革，因为在理论上，谁都可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讨论当前的重大问题。①

人民社会同盟的历届政府，都没有能够摆脱宗派斗争、互相倾轧和贪污腐败。柬埔寨政治家没有经验，主要是由于他们基本上缺乏教育。这种情况过去曾经使得民主党吃过苦头，现在又几乎使人民社会同盟吃同样的苦头。甚至连国民议会，有时也与政府过不去，正如它在过去政党统治时期所做的一样。但是柬埔寨国内这种时张时弛的局势，与它取得独立以来所面临的对外政策

① 1958年3月23日，柬埔寨举行新的选举。西哈努克亲王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六的票数，当然，又一次取得了国民议会的全部席位。（仅有一席受到人民派的竞争，它在全国选举中获得了三百九十六票。）民主党没有参加这次选举，因为自1957年8月一些民主党党员遭受暴力打击以后，民主党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但是，越来越多的前民主党人士听从了西哈努克亲王关于在人民社会同盟内部开展合作的呼吁，其中一些人获许以人民社会同盟候选人的资格参加竞选，这样这些人也就包括在当选的行列之中。——作者

中的问题比较起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人民社会同盟执政以后，西哈努克亲王的活动重心转向国际舞台。

七

今日世界中的柬埔寨

柬埔寨在外交事务中的态度，大致象其他国家的态度一样，主要地取决于历史的经验和条件。因此，在叙述柬埔寨自1953年独立以来在对外政策的发展方面所走过的独特历程之前，重温一下它的某些历史经验，是颇有裨益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柬埔寨人对越南的宿怨世仇可以追溯到好几世纪以前，在那些年代安南并吞了柬埔寨大片的土地。正因为这样，柬埔寨人在反对越盟的斗争中，对这些仇敌的憎恨，与其说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倒不如说因为他们是越南人。1954年越盟对柬埔寨的入侵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憎恨情绪，并增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共产主义不过是越南人的一个口号罢了。因而柬埔寨对共产党的国际性阴谋没有什么警惕。在法国也好，在美

国也好，都可以听到关于印度支那战争是共产党侵略的结果的宣传。但在柬埔寨，这种宣传却很少为人相信。柬埔寨认为它自己是为了争取国家的自由而既同越南人又同法国人作战的，把共产主义看作仅仅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经历过印度支那战争的柬埔寨，本应十分担心共产党北越，但是，它把对安南人的传统的宿怨和怀疑不仅加在共产党北越身上，也施加在反共的南越身上。

至于柬埔寨另一个主要邻邦泰国，由于它在日本占领柬埔寨期间再次强占了柬埔寨的西部省份，就很自然地激起了柬埔寨的民族主义情绪。况且，泰国对柬埔寨的叛乱分子的支持，西哈努克国王并非熟视无睹。他在“争取独立的改革运动”期间，曾自愿跑到曼谷去流亡。当时他是作为一个政治避难者，而不是一个在朝当政的君王而受到泰国的接待的。对于这一点，西哈努克国王也未尝忘记。（第三个邻邦老挝，和柬埔寨只有一段较短的共同边界，可算是一个例外：尽管柬埔寨和许多与它既没有共同的问题又没有共同的利益的非常遥远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和老挝却多年没有互换外交使节。这可能是因为

柬埔寨对这样一个仍然比较弱小、比较落后的国家有些瞧不起。但是，它对老挝并不存在怨恨。）

对于不久以前才从一个欧洲殖民强国手中获得独立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但是，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柬埔寨在获得独立之后，与法国的关系改善到可以用亲密二字来形容的程度。许多法国顾问留在柬埔寨政府中工作；许多法国军人继续留下训练柬埔寨军队，尽管仅仅由于柬埔寨军官会说法语。法国的文化影响现在还相当大。事实上，这种文化影响留下了一笔特殊的政治遗产。如前所述，大多数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官员是右倾的。但是，大多数法国籍的中小学教师，正如他们在法国一样，都是左倾的。其中许多人还留在柬埔寨，他们使得他们所教过的柬埔寨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多少有点认识。除此之外，柬埔寨的留法学生也从法国带来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他们的数目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增加。这些青年中间有许多人回国时带来了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盛行的左倾思想和中立观点，另外一些人则是作为共产党的代理人回国的。不过，

在柬埔寨，即使是极左分子，其表现充其量也不过是搞些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拥护“和平”与中立之类的宣传，并不怎么提倡共产主义。在一个既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土地问题，也没有多少赤贫现象（尽管其生活水平相当低）的国家，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毕竟是有限的。

皇廷最高会议顾问桑·萨里在他所著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功业集》一书中，评述柬埔寨对待邻国的态度时，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谈到了柬埔寨的外交成就，尤其是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同四十三个左右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些人可能问，”他写道，“为什么柬埔寨至今尚未和法国以及自己的邻邦签订任何协定，以改进彼此之间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合作关系。……主要原因是，不管签订什么样的协定，柬埔寨今天所享有的完全的独立与主权均有可能受到损害，那怕这种损害是如何轻微。因为任何一个国际性的协定事实上都是相互让步的产物。毫无疑问，这样的让步带来某些好处，但也得相应付出代价，让对方占些便宜。”谁也没有能够象他这样明确地说明了柬埔寨不愿意签订国际性协定的民族主义立

场。例如，对泰国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事，在柬埔寨看来，这是泰国为了得到美国的保护而出卖自己的一部分独立的明证。对南越也有类似的看法，柬埔寨怀疑南越如此明显靠拢西方是拿一部分主权去作交易。

不过，柬埔寨在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过程中，并没有变成一个反对西方的国家。由于深切了解到共产党对越盟的支持，柬埔寨的有责任心的人们，包括那些自由战士，都期望得到西方的援助，以取得和保卫他们的自由。甚至山玉成也要求法国“学习英美的样子”，同时他在一些宣传中还许愿说，一旦他为柬埔寨取得了独立，柬埔寨将“高兴地参加民主国家的集团”。西哈努克国王在他给阿里奥尔总统的著名信件中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例如，他表示，柬埔寨获得自由以后，很可能同法国发展类似菲律宾获得自由之后与美国之间的那种关系。

西哈努克国王在1953年出版一本关于柬埔寨争取自由的斗争的《黄皮书》时，在该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书向美国人民证实，许多渴望得到自由的国家，对光荣的强大的美国

寄予深切的期望，因为他们懂得，许多民族的自由乃至其生存，都要有赖于美国。”西哈努克也十分清楚，美国就是在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时，也曾一贯地支持和提高柬埔寨的国际地位：早在1951年，美国和柬埔寨就已签订经济、军事援助协定，尽管随后好几年这些援助是在西贡办理并通过法国人转送给柬埔寨的。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大使才到金边。

在日内瓦会议上，柬埔寨因为几乎不客气地反对共产党国家而使世界为之震惊。尽管日内瓦会议准备在关于柬埔寨协定中写上类似老挝、越南协定中的限制性条款，尽管孟德斯—弗朗斯总理① 不惜把他的政治生涯作孤注一掷，力图赶在1954年7月20日午夜之前达成一项协议，但柬埔寨代表团却毫不让步：在泰潘、桑·萨里和龙金尼的领导之下，代表团不为莫洛托夫的威胁所动，坚持不签署任何禁止柬埔寨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或者禁止柬埔寨允许外国在它的

① 孟德斯—弗朗斯（Mendès-France）于1954年6月17日就任法国总理兼经济计划部长，随即率领法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译者

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或向外国要求军事援助的协定。柬埔寨愿意单方面作出保证，它将恪守中立，它的军队不超过一定的编制。但是，柬埔寨不能接受外国对它的主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由于柬埔寨没有妥协，它所坚持的各点实际上都如愿以偿了：日内瓦会议最后签订的协议仅仅禁止柬埔寨缔结任何军事同盟条约，如果此项条约“不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仅仅禁止柬埔寨“当它的安全不受到威胁时”允许外国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仅仅禁止柬埔寨接受外国军事援助，“除非为了有效地保卫本国领土的目的”。[①] 总之，柬埔寨保留自由行动权，尽管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柬埔寨并无意利用这一自由去参加任何共同防御组织。

逊位之后，西哈努克亲王随即往新德里访问尼赫鲁总理。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本来不是很友好，因为在尼赫鲁看来，山玉成是一个较为热烈的民族主义者，西哈努克不如他，而且，尼赫鲁还于1954年10月会见过前抗战领导人山玉成。但

① 详见《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第五条（《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第70页）。——译者

是，这次尼赫鲁和前国王西哈努克的会见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西哈努克亲王对尼赫鲁的中立立场表示赞同，并毫不迟疑地接受关于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互不侵犯、平等等不触犯别国利益的原则，即尼赫鲁和周恩来倡导的“五项共处原则”。①他们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提到了“印度和柬埔寨之间年代悠久的历史上的联系和紧密的文化亲善关系，使得柬埔寨代表团团长和印度总理能够了解和尊重彼此的观点。”西哈努克亲王还率领柬埔寨代表团出席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上，他重申坚持中立政策，即与东方、西方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不介入东西方之间的冲突的政策。这一政策甚至获得了老是怀疑西哈努克一味向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民主党的热情赞扬。

但是，西哈努克亲王十分清楚，即使是中立的柬埔寨，也需要有保卫祖国的手段。在通过法国而间接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之后，他十分急于

① 此处原文有遗漏。“互相尊重”应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应为“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应为“平等互利”。“五项共处原则”应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译者

同美国建立关系，以便柬埔寨能直接获得美国军事装备和财政援助。1955年初，兰涅特政府组成以皇廷最高会议顾问桑·萨里为首席代表的柬埔寨代表团同美国谈判关于接受美国援助的协定。但是，民主党马上声明说，为了筹备选举事宜而成立的兰涅特政府无权进行这类谈判。同时民主党还要求参加这次谈判，但没有成功。

民主党这样做不是反对美国军事援助，而是不信任兰涅特政府，担心政府可能为了获得美国军事援助而暗中出卖国家主权。当美国援助协定[①]最后公布时，选举运动正处于高潮之中，特别是民主党的左翼分子就抓住这个协定大做文章，与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紧密配合在一起。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印度代表团也以极其怀疑的眼光审查这个协定，尽管最后国际监督委员会还是宣布此协定的实施与日内瓦协议并不相抵触。[②]可是，西哈努克亲王觉察到要替政府这样

① 关于美柬军事援助协定的详细内容，参看《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第373页《美利坚合众国和柬埔寨王国的军事援助协定》。——译者

② 详见《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第378页《柬埔寨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第三次临时报告（摘要）》。——译者

一个基本上不受欢迎的行为作辩护，是为难的。于是他只好声明，他和这次谈判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在他看来，这个协定不见得有什么危害。此外，他答应将外援这个总问题再次提交给人民讨论。

现在可以看出，西哈努克亲王之所以没有挺身而出为这个美国军事援助协定作强有力的辩护，以及兰涅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顾虑重重，乃是由于政府没有同反对党磋商，这样就给反对党提供了一个宣传题目。此后，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人民社会同盟非常急于表白，他们绝对没有出卖柬埔寨的利益。他们这种急切的心情使得他们有时表现出一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力图证明柬埔寨即使是接受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也还是“真正独立的”。1955年年底召开的重新审查美国军事援助问题的全国代表大会仅仅声明，柬埔寨将接受“来自任何国家的援助，只要它不损害本国的独立、主权和中立。”尽管不久以前，即1955年8月，柬埔寨刚刚接到关于越盟在它东北边境活动的消息时大吃一惊，西哈努克亲王依然认为同共产党国家建立直接联系是明智的，因为这样做可以表明他的独立性。印度政府也竭力鼓

励他这样做。

对西哈努克亲王来说，要显示他在外交事务中的独立性的机会是不少的。例如，他访问马尼拉时，就直接了当地拒绝发表任何稍有可能被解释为赞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共同防御的声明。老实说，菲律宾领导人不加掩饰的谈话，使他感到很不习惯，也多少有点恼火，因为在柬埔寨国内，就是法国人也一向对他非常恭敬，何况他还是真正东方式的阿谀奉承的对象。菲律宾领导人虽然对他表示友好，但他们的态度很粗率，他们直言不讳地向他谈到他们所奉行的政策的好处，而这种政策是跟他自己所奉行的政策不相同的。这种态度与他下一个要访问的国家的东道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态度相比，就截然不同，显得特别令人不快。中国共产党人对柬埔寨恪守中立的决心感到很高兴，对西哈努克亲王具有政治家的远见眼光和勇敢精神表示祝贺。① 他们谈到和平共处，

① 1956年2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应我国政府邀请率领柬埔寨国家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并于2月18日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发表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公报。同年11月，我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柬埔寨，11月27日周恩来总理同桑云首相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决心彻底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持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译者

答应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并且还向西哈努克亲王表示，万一他和越盟发生麻烦，他只需要向北京说一声，就可以使越盟住手。西哈努克亲王回到金边时，觉得他已结识了有用的新朋友，一旦他的老朋友认为非依靠他们不可时，这些新朋友就可以起抗衡的作用。

随后不久，柬埔寨与美国的关系发生了危机。尽管柬美之间的分歧很早以前就已经解决了，但这次危机的根源和性质对于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里面差不多包括前面已经谈到的所有因素：对安南人的宿怨、对泰国的担忧、国内关于独立之争的余波、中立立场、对集体安全的独特的看法、民族主义、以及西哈努克亲王特殊的敏感，还有他的精明的政治洞察力和领导才干。

1956年2月，西哈努克亲王刚从北京回来，就知道了许多事情。例如，南越突然中断了和柬埔寨的全部贸易往来。虽然它没有作任何公开的说明，但是，很清楚，吴廷艳总统之所以恼火起来，是因为柬埔寨的报纸纷纷指控南越政府破坏边界（虽然这显然是叛乱分子在边界线一带活动

所造成的)，并重新提出柬埔寨对交趾支那的领土要求(交趾支那的面积为南越的一半)。这些分歧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渊源。尽管这场新的争论是西哈努克亲王自己于同年年初在法国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挑起来的，可是，当西哈努克亲王又获悉“美国援助的进口物资已经停止”时(实际上是因为发现了一些舞弊问题，柬埔寨政府自己提出美援进口物资暂时中止)，他认为他提出这场争论是很恰当的，很适时的。他还听到美国代表对他前些时候所发表的声明感到不满（这确是事实），因为在那个声明中，他把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同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加以比较，竟诋毁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西哈努克亲王从中国旅行回来时，得意洋洋，但又担心由于和共产党中国调情而受到美国的制裁。在 2 月29日国民议会上的一篇讲话中，他抱怨“美国只肯帮助那些听它指挥的国家”，并且把这种情况和周恩来最近向他提供的“无条件”援助① 作了对比。

---

① 1956年 4 月24日中柬两国在北京签订中柬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同年 6 月21日在北京签订中柬经济援助协定和实施援助协定的议定书。根据经济援助协定，中国无偿地援助柬埔寨价值

在同一篇讲话中——看来讲话稿是在时间很仓促，心情很激动的情况下拟出的——西哈努克亲王再次详尽地陈述了柬埔寨对南越的领土要求，显然无意改善柬埔寨和南越的关系。他还说，“美国人不满意，是因为我已拒绝了菲律宾的建议，不肯依附于东南亚条约组织，而且因为我曾公开说美国的援助是要使富者更富。……如果美国人停止对柬埔寨的援助，我们这边决心忠于我们的中立政策。我们既不接受苏联的援助，也不接受中国的援助。”但是，他又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向一个国家要求经济援助，就有好几个国家赶忙响应我们的呼吁……如果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配合得很好的话，我们的国家就会象印度一样得到足够的外援，我们国家的主权将得到加强。我们愿意接受左、中、右各方面的援助，只要它能稳定我们的政策就行。”换句话说，西哈努克亲王埋怨所谓的美国压力。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美援会被取消。他声明他不能

八亿柬币（约合八百万英磅）的物资和商品。1956年8月，柬埔寨派出驻北京经济代表团，9月我国派出驻金边经济代表团。——译者

单靠共产党的援助，而他之所以希望得到共产党的援助，正是因为他感到这种援助能对美国的援助起平衡作用，并使他的国家较少地受到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压力。

这次柬美关系危机在外交方面的情形是复杂的，不可能加以详细讨论。正如在外交危机中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往往一些与外交危机毫无关系的问题，突然变得与它有关起来，接踵而来的是连锁反应，分歧扩大了，火气也大了。在这次柬美关系危机中，自发的示威游行很快就席卷了整个柬埔寨，使人回想起类似当年要求国王推迟1955年的选举的那次所谓自发的，实际上是组织得很好的示威游行。示威者举着书写整齐的标语牌和旗子，抗议“外国对柬埔寨的中立施加压力”，暗指美国有意拖延修筑一条通向海港的新公路，好让越南人①便于扼杀柬埔寨。（标语牌写着：“如果外国人不修筑通往磅逊的公路，我们就用自己的双手来修筑它。”）美国对柬埔寨的军事预算的援助是用实物而不是用现金支付一

① 这里的“越南人”和下文的“越南”，都是指美帝在越南南方扶植的傀儡政权。——译者

事，突然被描绘为对柬埔寨的一种污辱（因为据悉，南越是得到现金的）。但是，使得西哈努克亲王大发雷霆的主要原因，是泰国国务院院长波銮汶·颂堪这时发表了一个泰国政府正在考虑关闭它和柬埔寨的边界的声明，因为这件事似乎说明，美、泰和南越正在互相配合，发动一个“对柬埔寨的中立施加压力”的运动。

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柬埔寨对越南和泰国的态度，而且也知道柬埔寨认为中立是国家主权的标志，认为与西方结盟等于放弃国家的独立，——只有不忘记这一切，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柬埔寨的领导人把他和邻国的纠纷断然归罪于美国。对于邻国，柬埔寨的领导人甚至同它们不共戴天的敌人表示亲善的时候，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争取它们的友谊。印度在外交上毫不犹豫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对当时时局的看法，而且毫无疑问，它是真心诚意这样做的，因为印度的外交也由类似柬埔寨的动机所决定的。

只要弄到一点新闻资料，柬埔寨就利用它来证实和加强关于美国而不是越南对柬埔寨施加压力的宣传。如果一家美国杂志刊登一篇对西哈努

克亲王进行恶意中伤的文章，柬埔寨就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在幕后策动反对柬埔寨的又一证据。另一方面，如果美国耐心地调停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分歧，劝阻泰国政府不要关闭边界，柬埔寨也认为，这是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事务进行操纵的明证。“总之，”1956年4月6日西哈努克亲王在唝吥的一次讲话中声明，“一贯宣称要维护小国的自由的美国人，正好向柬埔寨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这不是一副高尚的面目。”但是，在同一次讲话中，他又声明柬埔寨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就不行，即使这种援助是带有“屈辱性”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试试看的话，”他说，“我们就会陷进共产党的势力范围，那将意味着我们中立的完蛋，也可能是我们独立的完蛋。”

对美国的这些指责是这样荒诞可笑，这样的不公正，以致使得美国怒气冲天。柬美关系史上这段插曲进一步加强了柬埔寨关于中立的独特的看法，但它并没有长期损害美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并非完全建立在感情用事上，而主要的是建立在维护柬埔寨的独立的共同

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正是为了这个原因，美国没有考虑要停止对柬埔寨的援助，尽管就某些有爱国心的美国人的本能反应来说，本来会这样做，也尽管西哈努克亲王本人一再说（并且相信）美国威胁要取消对柬埔寨的援助。

西哈努克亲王由于激烈抨击美国，获得了反对党的一致支持，从共产党一直到民主党的右翼都支持他。凡是看过本书前两章的读者，对于这一层决不会感到意外。事实上，西哈努克亲王从未象他起来反对柬埔寨所憎恶的邻国和他们的强大的保护者①的似是而非的压力时那样获得举国上下的支持，因为他不仅以柬埔寨的中立与主权的名义，而且以既从东方又从西方得到同等的援助和同等的友谊的和平政策的名义，有意同这些国家疏远。而对共产主义的危险，则从未怎么把它放在心上，现在更是暂时把它完全置于脑后了。

1956年年底，西哈努克亲王去莫斯科、华沙

① “柬埔寨所憎恶的邻国”，指泰国和美帝在越南南方扶植的傀儡政权而言。“他们的强大的保护者”，指美国。——译者

和布拉格访问（他还访问了奥地利、西班牙和瑞典），再次赞同“共处五项原则”。[1]一时看来他完全上了共产党所声称的友谊与同情的当。其实，西哈努克亲王只不过试图弄到一些法码加在天平上以保持均衡罢了。同时他十分清楚，只有美国不把它的法码从天平的另一端拿走，他才能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均衡。后来这种认识就逐渐变成一种固定不变的观念。而且，现在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的这次柬美关系的危机，留下了一个奇怪的后果，那就是，他对美援的看法有了改进，愈加认识到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对保持柬埔寨的独立是不可缺少的。

就这样，柬埔寨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不偏不倚。但是，尽管它自我陶醉于这种保持平衡的做法，有时也难免往下看看在它下面的深渊。柬埔寨的领导人慢慢地明白过来，美国的援助同共产党中国的援助之间有实质上的不同。因为美国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它根本不可能在柬埔寨捞到相应的好处，而中国则能够动员它在柬埔寨境内的

① “共处五项原则”应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译者

二十五万华侨和随时召集一度曾在北越的指挥下作战的游击队。而北越则又可能动员它在柬埔寨境内的三十万左右的越侨。1957年年初，西哈努克亲王又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考虑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遵照西哈努克亲王的意见，发表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重申柬埔寨保持中立和不介入任何军事的或意识形态的结盟的决心，表白它自己的和平意图，并声明柬埔寨如果受到侵略，它将进行自卫。决议还说，如果受到这样的侵略，柬埔寨将首先向联合国呼吁。但是，决议最后指出，如果联合国无法给予及时的帮助的话，柬埔寨将寻求“一个友好国家”进行干预。

虽然这段话是用外交上的措词写的，但是它却意味着，万一共产党给柬埔寨制造严重麻烦的话，西哈努克亲王将毫不迟疑地寻求西方的帮助——即使这可能需要寻求柬埔寨的反共邻国，即柬埔寨所憎恨的安南人的后代以及吴哥的征服者泰国人的支援。

参 考 书 目

埃田纳—佛朗苏瓦·厄莫尼耶：《柬埔寨》，1900年巴黎勒鲁出版社版。(Etienne-François Aymonier, *Le Cambodge*; Paris, E. Leroux, 1900.)

阿代马·勒克累：《柬埔寨史》，1914年巴黎格特内出版社版。(Adhémard Leclère, *Histoire du Cambodge*; Paris, P. Geuthner, 1914.)

乔治·马斯佩罗：《占婆王国》，1928年巴黎格·旺奥斯特出版社版。(Georges Maspéro, *Le Royaume du Champa*; Paris, G. van Oest, 1928.)

马夏耳：《吴哥庙宇考古入门》，1928年巴黎格·旺奥斯特出版社版。(H. Marchal, *Guide Archéologique aux Temples d'Angkor*; Paris, G. van Oest, 1928.)

科代斯：《为了深入了解吴哥》，1943年河内远东印书馆版。(G. Coedès, *Pour mieux comprendre Angkor*; Hanoi, Imprimerie d'Extrême Orient, 1943.)

亨利·吕西耶：《柬埔寨王国简史》，1944年河内远东印书馆版。(Henri Russier, *Histoire sommaire du royaume du Cambodge*; Hanoi, Imprimerie d'Extrême Orient, 1944.)

莫里斯·格雷兹：《吴哥地区古迹》，1944年西贡阿耳贝尔·

波太伊印书馆版。(Maurice Glaize, *Les monuments du groupe d'Angkor*; Saigon, Albert Portail, 1944.)

科代斯：《远东印度化诸国古代史》，1944年河内远东印书馆版。(G. Coedès, *Histoire ancienne des états hindouisés d'Extrême Orient*; Hanoi, Imprimerie d'Extrême Orient, 1944.)

法兰西出版局：《吴哥，高棉艺术的复活和法国远东学校的工作》，巴黎法兰西出版局版。(Office Français d'Edition, *Angkor, la resurrection de l'art Khmer et l'oeuv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Paris, Office Français d'Edition.)

亨利·帕芒提耶，《吴哥游览指南》，1950年西贡阿耳贝尔·波太伊印书馆版。(Henri Parmentier, *Angkor* (A Guidebook); Saigon, Albert Portail, 1950.)

劳仑斯·布里格斯：《古代高棉帝国》，1951年费城美国哲学会版。(Lawrence P. Briggs, *The Ancient Khmer Empire*;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 Society, 1951.)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伯希和译，1951年巴黎美洲及东方书店版。(Chou Ta-kuan, *Mémoires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 (P. Pelliot); Paris, Librairie de l'Amérique et d'Orient, 1951.)

柬埔寨王国政府：《柬埔寨要求恢复独立黄皮书》，1954年巴黎中央商务印书馆版。(Gouvernement Royal du Cambodge, *Livre Jaune sur les revendications de l'indépendance du Cambodge*; Paris, Imprimerie Centrale Commerciale, 1954.)

雷金纳德·勒·梅：《东南亚文化》，1954年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公司版。(Reginald le May, *The Culture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4.)

桑·萨里：《诺罗敦·西哈努克的伟大形象》，1955年金边皇宫印书馆版。(Sam Sary, *La grande figure de Norodom Sihanouk*; Phnom Penh, Imprimerie du Palais Royal, 1955.)

桑·萨里、毛塞合著：《诺罗敦·西哈努克功业集》，1955年金边阿耳贝尔·波太伊印书馆版。(Sam Sary and Mau Say, *Bilan de l'Oeuvre de Norodom Sihanouk*; Phnom Penh, Imprimerie Albert Portail, 1955.)

贝尔纳尔—菲利普·格罗斯利埃：《吴哥的艺术和文化》，1957年纽约布莱格公司版。(Bernard-Philippe Groslier, *The Arts and Civilization of Angkor*;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7.)

索 引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安恩(亲王)(Ang Em,Prince)
安依二世(Ang Non II)
安赞一世(Ang Chan I)
安赞(国王)(Ang Chan,King)
兰·涅特(Leng Ngeth)
布拉格(Prague)
布里格斯,劳伦斯·帕(Briggs, Lawrence P.)
札多木(Chadomuk)
东京(越)(Tonkin)
东京(日)(Tokyo)
艾·西郡(Ea Sichau)
艾德礼,克莱门特(Attlee, Clement)
尤金尼(Nong Kimny)
占婆(Champa)
占族人(Chams)
北京(Peking)
尼赫鲁(Nehru,Jawaharlal)

六 画

交趾支那(Cochinchina)
兴昭(Hem Cheao)
达柴(T-Chay)
考伦山(Phnom Koulen)
达布隆寺(Ta Prohm)
托摩·拉嘉二世(Thomma Racha II)
吉·哲塔(国王)(Chey Chettah, King)
吉·哲塔二世(Chey Chettah II)
吉·哲塔四世(Chey Chettah IV)
芒尼朋(亲王)(Monipong, Prince)
西贡(Saigon)
西伏塔(亲王)(Sivotha,Prince)
西索瓦(国王)(Sisowath,King)
西山叛乱(the Tay-Son Rebellion)
因陀罗补罗(Indrapura)
因陀罗跋摩三世(Indravarman III)
华沙(Warsaw)
华列拉岬(Cap Varella)
那伽(Naga)
那波勒(海滨浴场)(La Napoule)

七 画

诃梨诃罗(Harihara)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Norodom Suramarit, King)
宾努(Penn Nouth)
海防(Haiphong)
涅·刁龙(Niek Tioulong)
高棉伊沙拉克(Khmer Issarak)
哥沙曼（王后）(Kossamok, Queen)
班迭斯雷寺(Banteay Srei)
勒克累·阿岱马 (Leclère, Adhémard)
勒克莱克（将军）(Leclerc, General)
勒杜尔诺·让 (Letourneau, Jean)
索塔一世(Sotha I)
索里约波（国王）(Soriyopor, King)
泰潘(Tep Phan)
柴桢(Svay Rieng)
贡布(Kampot)
恩达巴特(Eintapath)
乌东(Udong)
乌迭(Outey)
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
桑·萨里(Sam Sary)

十一画

混填(Kaundinya)
菩萨（省，市）(Pursat)
莫尼旺(国王)(Monivong, King)
莫斯科(Moscow)
莫尼雷特（亲王）(Monireth, Prince)
莫洛托夫 (Molotov, Vyacheslav)
曼谷(Bangkok)
阇耶跋摩二世 (Jayavarman II)
阇耶跋摩七世 (Jayavarman VII)
阇耶跋摩八世 (Jayavarman VIII)

十二画

湿婆(Shiva)
渥太华(Ottawa)
越盟(Viet Minh)
斯大林(Stalin, Josef)
惠·甘德(Huy Kantoul)
琼·莫舒皮 (Chhuon Mochulpich)
蒋介石(Chiang Kai-shek)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

十六画